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利马窦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利 玛 窦 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通向中国之路.....	002
第二章	泰西儒士.....	011
第三章	向北京的初次试探.....	029
第四章	再次向北京进发.....	048
第五章	在北京的岁月.....	065
第六章	利玛窦的历史性意义.....	111

第一章 通向中国之路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航海大发展时代，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寻求海外贸易并扩大其财源和势力范围。首先是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沿着新航线来到了印度、马六甲，然后又到达中国和日本。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马大·利奇(汉名利玛窦，以下皆称利玛窦)就是到远东传教者之一。

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就离佛罗伦萨不远。马切拉塔位于马尔凯省(或者说边境省)，从前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古罗马时代，马切拉塔这个位置就有一座城池。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马切拉塔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他是长子，至少有6个弟弟和1个妹妹。利玛窦从幼年起就听到古文物的传闻——不仅有古典时代的痕迹，还有峨特时代末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如14世纪中叶筑起的城墙，豪华的宫殿和1550年根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设计建造的圣处女玛丽亚那座优雅的教堂。

然而，在利玛窦看来，所有这些自然美，这些历史陈迹和艺术的壮丽，比起基督教奇迹来，都黯然失

色。他小时候就常参加重大节日活动中的迎神活动，并在尼古拉·本奇韦尼神父创办的学校里学习基础语法。利玛窦后来说是这位神父“正当我们的年龄太小，因而最危险的时候，以无比厚爱教育了我们，引导我们走向今日的状态”。但他不到7岁的时候就与神父分手了，因为神父进了耶稣会。直到1561年5月，小利玛窦才又进耶稣会士办的小学念书。

在这座小学里，利玛窦结识了许多后来富有成就的伙伴。利玛窦学习很认真，在人文科学和文字课程方面成绩优异。他早就考虑日后要当教士，不过还在犹豫是进耶稣会呢，还是进嘉布遣会。他父亲首先关心的是家庭的前途，明白地告诉他说，他还太年幼，谈不上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他父亲在罗马有许多亲友是几位枢机主教的左右，于是就把这少年送往罗马去学法律，也许还暗中企望他在宗教界创造辉煌的事业。

就这样，1568年10月或11月，年方16的利玛窦一去不复返地告别了度过可爱的童年的迷人的马切拉塔。法学学习突出的性质是实证性和实用性，这虽然与古罗马精神丝丝入扣，相得益彰，却似乎对少年学生利玛窦没有吸引力。他本人的兴趣在他就读的罗马公学的创办者——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

耀拉那。表现耶稣会这个新教派的思想最清楚的，是圣安德烈备修院的装饰。殉教的场面对利玛窦影响极大。以后连续三年，利玛窦一再失望，焦急地等待获准加入某个教团，从而成为这支殉教候补者大军的一员。就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教父们改组这些教团，主要是为了促进文艺和科学。在日耳曼公学，创立了五个这种教团，每天傍晚做尊崇圣母功课时，人们高唱圣母颂。大约1559年底前后，圣母报喜第一教团过于兴旺，只得一分为二，小的吸收18岁以下的少年，利玛窦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每星期六都去教堂参加圣母启应祷歌唱。1570年，他礼拜的位置转至一个大分部。

对于利玛窦而言，圣母会只是“备修院的进身阶”。19岁那年，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入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不愿结婚等想法。父亲收信后，拟前去劝阻他，可是还没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父亲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利玛窦，同意他入耶稣会。1571年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利玛窦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圣安德烈备修院。

在备修院里，利玛窦在法比乌斯·法比伊斯神父的熟练指导下遍历圣依纳爵“心灵功课”的全过程。

正是这位神父日后担任了罗马公学校长，为利玛窦争取到了出国传教的资格。在备修院学习13个月之后，利玛窦于1572年9月15日按照惯例搬进了罗马公学。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利玛窦奉命由克洛德·阿夸韦瓦神父指导。这位神父后来担任了耶稣会第五任总会长。

以后几年中，除去佛罗伦萨小住之外，利玛窦一直在罗马公学学习。不论是文科、理科，还是神学，他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师从数学家克拉韦乌斯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对他日后在中国传教帮助很大。这几年中，耶稣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新任总会长比利时人艾弗拉尔迈居里安十分重视东方传教，并派范礼安神父为观察员去组织驻印度、日本和中国的机构。利玛窦和他许多同伴一样向往去东方传教。当人们在罗马听说，东方传教团检察师马丁·达·萨华前来招收助手时，他再次报名参加，甚至和同伴跑到罗马城外去迎接这位传教士。利玛窦获得了他人垂涎的恩典。当耶稣会总会长想恩准他顺便回家与亲人团聚时，他谢绝了，只是在临行前与薛华神父、巴范济神父一道请求教皇格列高利八世的祝福，然后于1577年5月18日离开

罗马，经由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前往葡萄牙。就这样他猝然结束了在罗马受训的时代，加入了复兴的天主教会在世界各地开创的宏伟事业。

不过，利玛窦不是先去中国，而是先去金色的果阿。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和传教权都操纵在葡萄牙国王的手中。所以利玛窦等人不得不去里斯本寻求葡萄牙国王的批准。

从1577年6月到1578年2—3月，利玛窦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学院继续他在罗马未完的学业。在此期间，也像在罗马一样，他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将在他孑然独处中国而且有可能看见使者被阻于印度，或从澳门被送往邻近的日本去传教的时候，从遥远的地方予以援助。1578年2月，他又在里斯本见到了几位意大利同胞，令他喜不自禁。3月24日，利玛窦和薛华神父向葡萄牙国王堂·塞巴斯蒂安辞行。国王不仅恩准他们前往东方传教，而且颁旨予以资助。

3月29日，14名耶稣会士(7名葡萄牙人，6名意大利人，1名弗莱明人)分乘三条船向东方进发。利玛窦乘的是所谓的“旗舰”圣路易号，同船的有上级教士孟三德，另两名葡萄牙人和罗明坚；阿夸韦瓦和巴范济则上了圣格列高利号。船队启动时，鸣礼炮，高唱赞美诗，欢送这些传教士。他们兴高采烈，

却不知道此去不仅会遭到扼守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英国“海狼”的抢劫，还会遭到危害更大的流行病的袭击。

在漫长而无聊的航程当中，利玛窦就作地理札记并实地学习海员实际运用的航海术。7月21日，他们看见了好望角。一个月后到达了莫桑比克，并在此住了将近一个月。9月13日，利玛窦等人抵达印度果阿。

然而并非一切都如他们在遥远的欧洲想象的那样，基督教不是无往而不胜。当时果阿正是疟疾猖獗、破坏极大的时候。年方25岁的利玛窦还未达到自然禀性与神恩之间温和的平衡，他变得非常敏感，甚至有点感情脆弱。但他还是经受了种种考验。他不仅自己攻读神学，还在果阿教希腊文和修辞课，1580年他又前往科钦教了四五个月。在科钦他被授予教士职，7月26日他非常庄重地举行了首次弥撒。之后他又回到果阿继续他的神学学习。

不过他的上级省区长吕伊·文桑特立即看中了他，让他把关于传教活动各色各样丰富的情况进行总结。利玛窦不仅出色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使他得以非同寻常地开始熟悉东方传教的生活，纠正了他在继承西方文明方面可能有的书本气和现成公式，他从四面八

方接获的丰富情报，却已经使他比别人更适合于顺应解决重大问题之需。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德罗耀拉主张既不要为学术而牺牲神学，也不要为神学而牺牲学术，认为对古典文化和新知识的真诚热爱，是极其密合无间地与基督教原理浑为一体的。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和继承，利玛窦比范礼安神父、比引导他进入中国的罗明坚神父，都毫不逊色。他已熟知拉丁文、希腊文、当代科学，尤其掌握了天文学，而在印度期间又表现出他对历史和地图学有特殊的才能。甚至对制造自鸣钟等手工技术和建筑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1581年利玛窦被授予神父职。此时利玛窦虽还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运用到传道实践中去，而且他的健康堪忧，两次病倒，但他还继续学习神学，并且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冒着酷暑，到辅助修士们的工场去学钟表、机械和印刷手艺。他就这样不知不觉为即将在中国进行的艰巨工作作好了准备。

范礼安神父于1578年7月抵达澳门，1579年7月7日又离开澳门，前往日本。孑然生活在澳门的罗明坚神父早就要求调利玛窦去当助手，因为他有数学才能。范礼安神父便从日本吩咐省区长吕伊·文桑特叫利玛窦中断学习，立即派往中国。这封信抵达果阿时已将近1582年封斋节末尾，复活节后

(4月15日)他就同其他7名耶稣会士一起开始漂洋过海了。

我们先介绍一下利玛窦此行的目的地澳门的情况。早在葡萄牙殖民印度时代，就多方刺探中国虚实，尤其觊觎广东香山县南虎跳门外的壕境(也写作蠓镜，即澳门旧地)。1517年葡萄牙人开始进贡。1521年明武宗死，皇太后下诏禁止葡萄牙人入贡。同年葡人兵船企图强行进入广州，被明朝官兵击溃。1522年和1523年明朝官兵又两次击退葡萄牙人的入侵。1531年嘉靖皇帝同意诸国进贡，唯独仍禁止与葡萄牙人贸易。但葡萄牙人借海上力量的强大，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1553年葡船托言借地晾晒，请求在澳门停泊暂栖，明朝海道副使汪柏接受贿赂，表示同意。1555年，葡萄牙人潜入澳门西浪白澳塔蓬栖息。这为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开始。至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未经允许就在澳门强盖房屋，结成村落。1564年葡萄牙人帮助明朝镇压了中国水兵起义，得以在澳门站稳脚跟。

1582年7月3日利玛窦一行抵达马六甲，葡萄牙人的这个堡垒这时受到了马来人的严重威胁，因而范礼安神父虽然扩展耶稣会士的居留地，却始终不敢创立公学。在海上历尽艰辛之后，利玛窦8月7日

在病中抵达澳门，从而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 28 年之久的传教历程。

第二章 泰西儒士

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耶稣会士就已试图到中国内地传教，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1575年，耶稣会士想把澳门一座佛寺里的一个沙弥吸引信奉基督，由于操之过急，差一点引起广州民变。于是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学会官话，不仅要能说，还要能读写。罗明坚神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范礼安神父本人也在几名翻译的帮助下查阅中文书籍。不过，罗明坚神父在1582年5月底去广东肇庆与制台交涉回来之后，身上长了恶疮，几乎一病不起，不能再去谈判。利玛窦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利玛窦非常走运，刚到澳门时常害病，但很快就痊愈了。于是他立即投入到汉语学习中。罗明坚和几名翻译对他很有帮助。不过利玛窦仍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甚至认为汉字这玩艺简直不可思议。

利玛窦的汉语虽进步很快，但范礼安神父等不到利玛窦掌握其运用，就要立即把它用于描述和介绍中国。因为欧洲人非常想读到关于中国的事情，耶稣会士必须使传教适应这些新民族，而过去对中国的描述

很少，而且混乱。所以范礼安神父想通过写东方传教创始人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记来系统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而且要求资料来源可靠。由于当时中国的印刷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所以解决资料来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完备的中文书库。罗明坚神父曾去广州采购，范礼安神父从日本来到澳门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积极搜罗五花八门的书籍。利玛窦在印度就以绘制地图和熟悉历史的本领表现出众，所以他被请求简略描述中国的情况。于是他利用罗明坚提供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写出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的三章。这三章有时单独刊行为小册子，题目就叫《论中国的奇迹》。整个传记完成于1583年6月13日。

利玛窦在《论中国的奇迹》中一方面相信他们带来的宗教优越，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中国文明的伟大。书中有21页谈中国的优点，只有8页说到混乱，还有两页可说是赞美某些特点。当然，人们不能希望书中的一切都是准确的。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之后，自己也批判这些早期的尝试。如利玛窦绘制的地图上标明的地名很稀少，这些地方的经度接近准确，纬度却非常失真，相差好几度。北京的纬度应是北纬40°，却被向北移到47°或48°。但无论

如何，1582—1583年勾勒的那幅图景仍不失为中国文明的初描，至今读来仍饶有趣味。

利玛窦的到来对罗明坚神父是一个道义上的鼓舞。虽然年轻的利玛窦神父很快就证明他作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能力使他能比罗明坚神父迅速得多地对中国进行相对而言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但他很尊敬这位先驱，并且善于吸收其经验。1582年将近12月初时，澳门几次收到肇庆制台来函要求罗明坚神父在健康情况允许时带上利玛窦从印度携来的自鸣钟去见他，并且允许神父们在该城建两座房子。一座是寓所，一座是教堂。这一消息使在澳门的神父们欢欣不已。于是范礼安神父指派巴范济神父和罗明坚神父前往肇庆，又命利玛窦神父主持圣马丁公学的望教事宜，等巴范济和罗明坚交涉成功之后再前往会合。

12月18日巴范济神父和罗明坚神父乘船前往肇庆。范礼安神父12月31日离开澳门前往果阿前就留下指令：如果交涉未果，巴范济神父仍回已派定的日本传教住所，罗明坚和利玛窦留下等待机会。

罗明坚神父去肇庆拜会制台比较顺利，他送给制台一座铁制自鸣钟、几具沙漏计和若干眼镜；然后委婉地提出想在中国学习，制台也似乎愿意让他们留下。

制台的主簿对他们很客气，所以准备让利玛窦携一件礼物给主簿祝寿，借机来到肇庆。罗明坚和巴范济还接受广州都司的意见，为了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把自己的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袈裟同化成中国僧侣。

利玛窦在澳门接到罗明坚的来信后，相信他不久就可以利用广州春季集市的机会去与肇庆的传教士会合了。不料没过几天，巴范济和罗明坚狼狈不堪地回来了。因为制台受到弹劾而丢了官，害怕继任者指责他把外国人引入中国，便急忙要把他们打发走，甚至不让他们等到新官上任。新制台上任后贴出告示对有些中国人教“番僧”说中国话很不满意。这样一来，利玛窦觉得要立足中国似乎是不太可能了。

然而没过一个星期，制台衙门的一个小吏接受了传教士们的重金贿赂之后，便发给正式批文，准许他们回肇庆建立住所和教堂。1583年9月1日，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乘船离开澳门，10日抵达肇庆。利玛窦等在肇庆知府王泮的帮助下，制台终于同意批准租与东关仙花塔附近地皮建立仙花寺(圣堂)。由于经费不足，罗明坚只得返回澳门谋求财源，留下利玛窦一人在肇庆。

对于神父们的到来，肇庆的居民，尤其是秀才们不满。而且葡萄牙人早就有偷吃小孩的恶名。仙花寺

建造过程中就常有人向屋顶扔砖头。不久，一帮秀才又联合诬告利玛窦拐卖小孩。官司虽然打赢了，但为知府制造自鸣钟的印度人被赶回澳门。知府重新下令保护外国人，利玛窦也就得以继续学习。

1854年春天，罗明坚神父把获得的大量布施带回肇庆，终于把房子盖好。知府王泮赠两块匾额“仙花寺”和“西来净土”。在王泮的影响下，肇庆其他官员纷纷与利玛窦交往。与此同时，利玛窦重写了一部中国记述，还附上一张中文的中国地图。1854年6—7月，利玛窦在一福建秀才的协助下，审订罗明坚神父初步编写的教理问答，把它从白话文改写成文言文。这一工作很艰辛，迫使利玛窦在汉语中找出最适合于表述基督教和西方思想的用语。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利玛窦长年坚持学习汉语，以至后来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写作、著书。这也成为他能在中国立足的重要原因。

罗明坚和利玛窦大力收集书刊，在肇庆寓所里陈列，并且让人参观。在陈列书籍的同时，他们也不断增添圣母和救世主的油画和图片。中国士大夫和官吏强烈贪求这类欧洲艺术品。王泮在绍兴的老父把儿子得自神父们的一幅美丽图片放在家里，每天跪拜。更使到教会图书室访问者赞叹不已的是利玛窦编制了第

一部欧洲文字和汉语对照词汇表。这部手稿共 189 张，分成三栏：葡萄牙词、意大利字母注音、汉字，只有头三页有第四栏意大利语词。

利玛窦带来了一幅世界地图。1583 年当他在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和我国古代的地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不画在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利玛窦一边给观众讲解，一边指点地图，说他出生在什么地方，由何处动身，经过了哪些国家才来到中国。听众听了都觉得惊奇，没想到世界如此广大，有这么多国家。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陆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周围，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貌都有所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有数学、测绘学方面的修养，立即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用中文印刷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

立即分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1584年到1608年，刻印或摹绘达12次，流传颇广。图名除了《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表》、《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使中国人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陆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世界各国的国名和地名。

在肇庆的活动既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开始，也是他思想走向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他潜心研究中国的民情风俗，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的情况，讲解经书。为了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并不急于传教，而是用西方科学技术、奇器、方物吸引中国人，博取他们的欢心。因为他摸透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每到一处，便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了保护人，站稳脚跟。而当时中国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兴教强国，渴望学到传教士手里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

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利玛窦在肇庆不停地制造和展览各种天文仪器，如浑天仪、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另一方面用作礼品赠送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成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所有西洋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二种，一是威尼斯玻璃制作的三棱镜，透过它看东西五光十色，被人们誉为“价值连城的宝石”；其二是自鸣钟，从1583年8月7日利玛窦把印度省区长送给他的那一座带到肇庆之后，开始蔚为时尚，利玛窦生前和身后始终不衰。最能讨万历帝欢心，并能使利玛窦可以在北京定居的器物也是自鸣钟。

当然利玛窦为了制造和得到这些物品，克服了许多困难。因为他缺少书，缺少原料，虽然他不停地写信索要，但总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不过利玛窦做到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器物来实现他的目的。但他在谈话中从不有意炫耀欧洲文明的先进，他待人温和、礼貌、文雅。这使得他能与官员和士大夫顺利往来。

利玛窦在肇庆时结交的高级官员除王泮外，还有广州布政司和广东都指挥使。他通过结交达官贵人、

名流士人，以交谈的方式介绍西方文明和天主教教义。

通过一系列活动，利玛窦和罗明坚终于使肇庆成为传播天主教的一个内地立足点。1585年8月，孟三德神父奉范礼安神父之命令，来肇庆主持传教工作。此时王泮已升迁岭西按察司副使，他和继任的肇庆知府都是浙江绍兴人；他俩坚持要神父们去绍兴再设一个居留地。当然传教士们欢欣不已。1585年10月20日，罗明坚神父和范礼安派来的艾美达修士在王泮的一个兄弟的帮助下，取道广东北部前往浙江。罗明坚等人的传教一开始比较顺利，1586年4月6日王泮的老父受了洗。但绍兴的士大夫们在同年6月就设法把这两人赶回了肇庆。

1586年春天西江泛滥，孟三德神父和利玛窦让许多居民寄寓教堂。当得知罗明坚等人被逐回时，他们意识到在肇庆只靠王泮一个人的庇护是不行的。他们甚至决定派罗明坚神父去朝拜少林寺，但半途而返。此后的几个月，情况进一步恶化。先是孟三德神父被迫返回澳门，不久罗明坚去找他，自己也回不来了。从1588年1月开始，中国传教团工作由利玛窦一人承担。

利玛窦虽与许多名流来往，但秀才和百姓仍然不满，一些新入教的人又行为不慎，使利玛窦的处境日

益艰难。保护人王泮担心丢掉乌纱帽，也想卸去这个包袱。1588年7月31日，范礼安神父到达澳门，他立即派艾美达修士前与利玛窦作伴。

艾美达修士刚抵达肇庆，广州一批宿老就联名控告传教士，说传教士建立仙花寺花费的巨额钱财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而那些人是图谋挑起民变的。此案转由肇庆知府衙门审理。利玛窦决定顶住压力不撤退。他和艾美达一同拜会知府，馈赠一个威尼斯水晶三棱镜。在王泮和知府的干预下，此案最终顺利了结，而且利玛窦有了自己名字的准许居留证，艾美达修士的留下也获得了默许。

虽然广州耆宿的控告被驳斥，但利玛窦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他和他的伙伴们早已被列入炼金术士一类。因为他们既过着隐修生活，又不向任何人化缘，那必定有招财进宝的神秘源泉。虽然利玛窦竭力剖白，但他越否认，人们就越怀疑他隐瞒真相。于是利玛窦想把银制圣杯换成铜镍合金的，但太晚了。早期来中国的欧洲人认为观音菩萨就是圣母玛丽亚，同样，中国人起初也认为上帝是个妇人。中国人还认为弘扬佛法者来自西土，新来的利玛窦等人也是来自西土，传教士们的传道活动统统得按佛教的模式进行。由于被看作和尚，寓所被看作和尚庙，利玛窦等人的地位在一

般中国人心目中很低下。但利玛窦很有耐心地进行传教活动。而且为了彻底汉化，从1585年开始，利玛窦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名字所用汉字接近欧洲语音，如“利”表示“利奇”，“玛窦”表示“马太”；此外，仿中国人习惯，利玛窦取字西泰。

与利玛窦对立的秀才和广州耆宿仍然没有放弃将利玛窦赶走的想法。1588年12月，当新任制台刘节斋上任后，听从属下的意见，下令将利玛窦等人解送澳门，或押往广东北部的南华寺，使其不容易与外界交往。

利玛窦趁刘节斋操练水师准备征剿海盗之时，听从肇庆同知的劝告，悄悄前往澳门向范礼安汇报。范礼安同意如果肇庆实在呆不下去了，可将居留地迁往别处。就在利玛窦返回肇庆之后，他认识了一位后来对他帮助极大的儒生瞿太素。

1589年5月，制台回到肇庆任所。尽管王泮从中斡旋，利玛窦本人也多次交涉，制台仍严令利玛窦返回澳门，不许在内地传教。此事由于广东巡抚的来访而似乎又有了希望。不过巡抚一走，制台就下了决心。8月初，刘节斋制台给予利玛窦60两银子，令其返回故里。利玛窦拒收银两，但被押解上船。刚到广州，利玛窦又被召回肇庆，制台允许他在广东省

境内除广州和肇庆外任选一地。利玛窦选定广西边境的南雄，制台却劝他先试一试南华寺或韶州城。8月15日，利玛窦和艾美达乘船离开肇庆。8月24日抵达南华寺，韶州知州派来的仆役和南华寺僧人前往迎接。8月28日一大早，南华寺的首座率三四名僧人骑马把利玛窦送到韶州城，艾美达则继续乘船前往。

到达韶州城的当天，利玛窦就拜会了韶州知府。虽然南华寺地理位置不太合适，而由于韶州城的条件不错，所以利玛窦决定在此定居，而不再前往南雄。当天下午，利玛窦拜见了韶州城的所有官员。由于他被说成是身怀无数奇技异能之士，所经之处，人山人海，都以一睹为快，弄得他头昏脑涨。

第二天，利玛窦在韶州知州僚属的陪同下选择住址。最后选定靠近僧寺而又繁华的西关为居留地。韶州官员写了回帖报制台批复，利玛窦同舟前往，催促此事早有结果。等候回批之时，传教士们暂住管理僧众的官员专用公馆。由于韶州10—12月流行三日热或疟疾，传教士们刚到不久就染上此病，其中艾美达差点丧命。9月25日或26日，在澳门的范礼安神父接到报告之后，不仅给建设居留地拨了充足款项，而且从印度召来苏如汉、罗如望两名葡萄牙传教士到澳门，要他们准备去内地传教。10月4日或5日，

韶州居留地房屋动工兴建。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房子没有楼，样子几乎完全是中国式的，只有小教堂面积大些，希望能容纳相当多的教徒。

大约也是在10月份，瞿太素前来韶州拜会利玛窦。瞿太素是江苏常熟人，其父瞿文懿曾任南京礼部尚书。瞿太素质质聪明，幼读群书，但不求科举做官。父亲去世后，他携妻子周游各省，沉耽于炼金术，把家产花光了。当利玛窦来到韶州时，他正寓居南雄。听说利玛窦在韶州，他赶来想拜利玛窦为师学习炼丹术，并在韶州西关的龙华桥搞到一套住房长期居住。来了之后他才知道，利玛窦并不是别人传说的炼丹家。在利玛窦的劝导下，他转学西方科学。这是利玛窦来华后收下的第一个学习西方科学的学生。利玛窦先教他同文算法，后教浑盖图说，最后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册。瞿太素学会了设计各式各样的日晷以记时辰，还能运用几何规则或尺度测量高度和距离。在学习过程中，他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语，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虽没有刊刻，然而他仍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并翻译西方笔算方法和欧几里得几何的人。当然，利玛窦在向瞿太素传教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灌输天主

教教义。

从1589年开始，一小群官员效法瞿太素，常与利玛窦交往，不仅韶州全体官员无一例外去拜会神父，去往居留地的还有兵备道、新任知府、知县、南雄知府和同知王应麟(后来成为利玛窦的有力靠山)。英德县令也强烈要求利玛窦到他家里去。1590年1月1日，他携一位修士和瞿太素乘船前往英德。英德县令为他安排了极其隆重的接待，几乎全城要人都来拜会。三四日之后，南雄同知又用官舟把他送回韶州。

韶州因为地处偏僻，显要的客人比在肇庆时少，但因瞿太素千方百计邀请名流，传教比在肇庆要顺利得多，利玛窦积极准备去他省建立居留地。不料艾美达修士再一次病倒了，而且若干邻里趁天黑扔石头围攻他们的房屋，撵之则逃，然后又大量涌来。围攻之事经瞿太素前往官府说项和利玛窦坚持大事化了而顺利解决。鉴于艾美达修士难以坚持工作，经请求官府也同意裴德立修士来韶州。

1590年7月初范礼安前往日本后，孟三德被任命为澳门神长和驻华传教团首座。他利用裴德立修士的护照来韶州视察了几天。利玛窦也开始研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1590年末，瞿太素离开了韶

州，不过并没有走得太远。1591年10月，艾美达修士再次疟疾发作，7天之后终于弃世而去。利玛窦显得极度的悲痛，并按中国风俗为艾美达修士举行了葬礼。孟三德神父立即派来裴德立修士来韶州协助利玛窦。

1592年春节，寓居南雄的瞿太素又来到韶州邀请利玛窦去南雄拜访许多朋友。利玛窦欣然前往，在南雄有10个人接受了洗礼。传道成功令人欣慰，可惜好景不长，裴德立修士因初来乍到，还没有能力单独照料居留地事宜，所以紧急请求利玛窦回韶州去。

回到韶州以后，利玛窦仍然致力于传教。但因瞿太素这位保护人1592年离开了广东，前来骚扰居留地的人日益增多。1592年6月底，利玛窦受到了严重袭击。20多个手持火把、梭镖、斧头、绳索的人翻墙进入居留地，见人就打，见人就砍。利玛窦从卧室跳墙而逃，由于窗子距地面有点高，所以把脚崴了，只能吃力地爬到墙根呼救。居留地的一教徒爬上屋顶用瓦片砸袭击者，袭击者才逃跑。被斧头砍伤的裴德立修士二个多月之后才勉强复原，利玛窦到9月1日才能艰难行走。韶州官府对袭击案无止无休的审讯也耗费了利玛窦的很多时间和精力。

1592年11月12日或13日，范礼安神父

从日本乘船抵达澳门。利玛窦立即前往，两人相见终成诀别。这次会见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范礼安认为在华直接传播天主教迟迟不得进展是因为对中国了解太少，他要求利玛窦继续研习中文。利玛窦认为他被挡在中国社会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和尚之间的那种纯粹是表面上的亲缘关系。因为传教士们也要剃须剃发，过独身生活，有庙宇，在规定的时间内念经。所以利玛窦建议蓄须留发，以免人们把他们看成僧人。但范礼安未敢当即就作出这一决定。直到1594年7月才正式通知利玛窦表示同意。

1593年1月17日，利玛窦离开澳门返回韶州。不久，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海南岛人氏)趁卸任暂归故里之机，和利玛窦交谈了一天一夜。王忠铭通过交谈就准备返任时带利玛窦前往，改革中国历法，借以获得北京的礼部尚书职位。

1593年秋，疟疾再次流行，居留地人员半数病倒。10月5日裴德立修士气绝。但利玛窦安然无恙。裴德立修士去世之后，范礼安又指派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郭居静神父来协助利玛窦工作。1594年7月7日郭居静抵达韶州，随即在利玛窦的指导下，致力于研习中文。利玛窦自己也遵照范礼安的命令继续进修。中断七八年之后，利玛窦又勇敢地研习中国

典籍。他在一位饱学秀才的指导下，一天两次奋力阅读他不能全懂的书藉，甚至还做作文。

为了便于其他传教士学习中文，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还加上许多注释。他每天给他的同伴授课三四小时。利玛窦研习中文进步神速也与他借助于一种异乎常人的“局部记忆功能”有关。这种功能基本上是属于视觉的：把一个词或一个方块字贴在某个物件上，在想象中追忆该物，从物及字或词。利玛窦多次表演他的这种特殊功能，把只看过一眼的一套又一套四五百汉字横背倒流，让到场的儒生十分惊愕。

1593年12月10日，利玛窦宣布已经译完“四书”中的三部(第四部是次年译完的)。1595年，他又誊清了用拉丁文意译的“四书”手稿。范礼安神父请人抄出来给驻日传教士使用。同年利玛窦停止散发在肇庆刊印的初级《教理问答》，1596年上半年销毁了印刷雕板，因为书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佛教用语到处可见。利玛窦准备重写一部，想引述中国典籍以权威论据予以论证。所以利玛窦以后对新来传教士讲解“五经”。

此时的利玛窦已蓄须留发，穿着打扮俨然如中国秀才，走到哪里都文质彬彬。当利玛窦第一次向新任

韶州知府引见郭居静神父时，知府以秀才礼待之。从此以后，其他官员接见他们也都如此。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人心中成了从西土来的泰西儒士。

第三章 向北京的初次试探

郭居静神父的到来使居留地里的人们欢欣鼓舞，然而到10月份他就得了疟疾，一个月之后才能起床。一些新入教的人有时热忱不可抑制，常给居留地的神父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于是范礼安和孟三德神父决定再开辟一个居留地，以免一个据点的取消带来整个传教团的毁灭。瞿太素坚持他们去江苏常州，但首先必须想个办法体面地离开广东省。

机会终于到来了，北京兵部侍郎石大人由原籍返回北京，途经韶州。石大人之子因院试落第而羞愧难当，遂成半疯，久治不愈。石大人原籍肇庆的一位商人向石大人推荐了利玛窦，说他能治好石大人儿子的病。石大人到韶州以后亲自拜访利玛窦，请求利玛窦协助治好儿子的病。利玛窦见机不可失，立即回答说：贵公子的病一天是治不好的，我可以陪同大人北上，一路为贵公子治病；而且我非常渴望一睹帝都之壮观。石大人当场叫知府颁发官凭给利玛窦。虽然文书规定了回程日期，只提到江西，甚至不准前往南京，但利玛窦已感欣慰，心想随同这样一位大员，就连执照也不需要了，根本的问题还是体面地离开了韶州。

次日石大人启程先行。利玛窦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留下郭居静和另外两名修士在韶州，他自己带了二名教理问答师随后追赶石大人。这时的利玛窦除了鼻子和眼睛外，从装束到说话已和中国儒生无差别。当然，利玛窦的革新也遭到了他的同行和后继者的非议。但利玛窦和范礼安相信，要渗入中国人心就必须改穿儒生服装。利玛窦还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如能在皇宫稍获成功就可以在所有省份引起震动，所以他迫切想进京面见万历皇帝，劝其改宗天主教。

利玛窦和石大人在梅关会合后乘船同往南雄，之后走旱路经过南岭、大庾岭到达江西赣州。途中利玛窦向石大人呈献了礼品：一只沙漏计和两把做工精细的扇子。石大人对沙漏计很感兴趣，多次和利玛窦谈欧洲各国的风俗习惯、科学和基督教。利玛窦提出想把居留地建立在广东以外的地方，石大人告诉他北京和南京没有什么希望，因为两地都是京城，若不进贡皇上，便会一无所获。石大人劝利玛窦把居留地建在他长期为官的南昌。后来，利玛窦又拿出他的书籍和数学用具给大人看，从此利玛窦作为科学家名声大噪，那些随行人员以及来拜会的官员也就改口称他为“大人”了。

过赣州时，利玛窦为了避免招摇和招人嫉妒，他

拒绝拜会当地官员，自己花钱雇舟欣赏赣江两岸的风光。二天之后，利玛窦随同石大人坐船前行。船到天柱滩时，船遇狂风倾覆，利玛窦虽然脱险，但与他同行的约翰·巴达拉斯未能幸免于难。抵达吉安以后，石大人准备走旱路去南京。利玛窦估计他将被打发走，于是他赶快装神弄鬼似地拿出一架威尼斯水晶三棱镜给兵部侍郎石大人的主簿看，这玩意可以分解太阳光，看风景如游仙境。他对主簿说：“您的主人如继续照顾我，把我一直带到北京，我就把这个送给他。”这一次一如常往，“价值连城的宝石”又发挥了作用。石大人垂涎此物，但只肯带他到南京，而且要他坐船随家眷、行李一起走水路。利玛窦同意走水路，但又要求发给他正式官照。于是去吉安知府拟就官照，准许利玛窦前赴南京、苏州、浙江及附近各地。利玛窦事后携一件小礼物和三棱镜拜见石大人并献上礼物，石大人虽推辞了半天，可最终还是收下了。

利玛窦在石大人的两名仆人的陪同下，继续坐船顺江而下，沿途一站站都受到热情款待。舟行9日，抵达南昌。南昌位于广州、韶州至南京、浙江的中点，虽在商业繁荣上和船舶往来方面不如广州，但景色优美，人才辈出。瞿太素和石夫人都劝他在此落脚。利玛窦也想把南昌作为退路，万一南京之行受挫，可以

回来。但苦于无人引见，于是他决定前往著名的道观万寿宫观光。见到利玛窦，很多人跑过来围观。当利玛窦解释他是西方来的洋儒时，人们就更起劲了，甚至有人要他向老子的像跪拜。利玛窦在随从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随后的几天，利玛窦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害怕闲人打搅。

再次出发之后，利玛窦一行经过小城南康，擦过庐山，由鄱阳湖进入长江。从韶州出发后第二十二日，船过驻有重兵的安庆。5月31日，利玛窦到达南京（或称应天府）。北京成为明朝首都以后，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但保留了六部机构，南京仍然是文化中心，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惯常居住之地。利玛窦在南京居住了半个多月，其间的强烈希望而后痛心失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利玛窦下榻于南京城门外的一幢房子里，由于观者如堵，兵部侍郎的仆人要他立即回韶州，并且不得泄露同他们主人的关系。利玛窦不愿失去石大人这个保护伞，反复强调他是经石大人允许来南京的，并自己去寻找旅馆。途中巧遇前肇庆制台刘节斋的儿子刘五的一个朋友，转而找到了刘五。在刘五的帮助下，利玛窦开始结交各色人物。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出门就坐轿，这样也免除了步行的疲劳。

不久，利玛窦就向他新结交的朋友说想定居南京，当然他绝口不提定居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要传播天主教。他的朋友们认为必须找一个地位够高而又比较容易接近的官员做保护伞。利玛窦很快打听到曾两次邀请他离开韶州，去别处定居的前广州兵备道许大人已升迁南京仪制司主管。得知这个消息后，利玛窦喜出望外，满心认为获准定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6月16日，利玛窦换上大礼服，提着厚礼，在一位医生朋友的陪同下去拜会许大人。许大人一如往常设宴款待。但当利玛窦说他是携兵部侍郎石大人的官照来到南京，现在希望能在南京定居，日后请大人多多关照和栽培时，许大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先是唉声叹气，就跟急疯了似的，不知如何是好。说着说着，他又大发雷霆，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狂动不已。最后他以害怕其他官员知道这次拜会为由，把利玛窦打发走了，并劝利玛窦离开南京，还许诺除了南京之外，去哪里他都愿意提供帮助。

等利玛窦垂头丧气地回到旅店，许大人的仆人就已来传店主去过堂。店主过堂回来告诉利玛窦说：“许大人斥责我里通外国；原籍肇庆的一名录事作伪证说您七八年以前就已被作为嫌疑犯赶出境外。于是许大人命令我把您送回广州，而且要我带回江西省的

批复。请您可怜可怜我吧。”利玛窦只得同意立即回江西，于是店主就去取保画押，保证利玛窦不会再前往浙江。并且很快为利玛窦雇到了船，呈验了租船文契。就这样，利玛窦满怀忧伤，甚至还有点发烧，于6月17日乘船登上归程。

利玛窦6月28日抵达南昌。因为不能居住在南京，也不能前往浙江，所以他只好全力赖在南昌不走，以免被赶回韶州或广东其他地方。这时的利玛窦经过对南京之行的思考，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信必须变生硬决定为坚持不懈的灵活耐性，克制西方人的急躁冲动，不要再说“一定要”，改口为“窃以为”，善于等待、迂回、盘算，以求打动他急盼争取的善变人心。

有江西制台衙门一位小吏的帮助下，利玛窦很快找到了住处。这一回他不像在南京那样，急于同外面的人交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足不出户，一边养病，一边悄悄地努力详细了解南昌城的情况，同时仅仅结交了几个朋友。

利玛窦在韶州的弟子瞿太素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建安王12岁的儿子，利用这种与如此显贵人物的亲密关系，瞿太素逢人就为利玛窦鼓吹。当利玛窦来到南昌时，他已在南昌显要中小有名气。利玛窦是通过南

昌名医王继楼进入上流社会的。在他拜会王继楼之前，王继楼已通过瞿太素久仰其名。这时的利玛窦也已知道在中国人之间自己不可失格，要保持尊贵的外表。他穿上绸缎官服，戴上儒生云巾，长髯拂胸，又如此通晓中国礼仪和典籍，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十分稀罕的。不久王继楼设盛宴回敬，还邀请了两位皇亲作陪。宴席上利玛窦坐在上座。席间，客人们都尊称他为“举人”；不过，当人们知道他不仅熟稔数学，而且懂得“六经”时，都钦佩地认为他够得上“进士”的条件。由于王继楼医生的鼓吹，利玛窦的名声广泛流传，而他自己又凭惊人的“局部记忆功能”在读书的士大夫阶层中获得了绝高的评价。经过这些士大夫的引见，利玛窦得以拜会其他官员和皇亲国戚。

当利玛窦向王继楼提出想在南昌定居时，王继楼为他出了一个主意。王继楼本人与兵部侍郎石大人私交甚笃，而利玛窦的官照也是石大人签发的。于是王继楼假装接到石大人的信，托他为利玛窦办理在南昌建立居留地的事宜。为避人耳目，利玛窦也暂时和王继楼疏远了。

但利玛窦再次犯了与在南京同样的错误。他自以为比较有把握了，没有经过主管官员的批准，他就搬到城外去住了，而且到处拜会。于是有人谣传利玛窦

到南昌有重大图谋，并且传到了总督陆仲鹤耳里。若非王继楼和另一位大儒章斗津为他在总督和其他要员那里说项，他可能会被赶回韶州甚至澳门。

总督府经过对利玛窦表面上的审问盘查之后，总督于1595年7月底或8月初接见了利玛窦。利玛窦如实回答了总督的提问，并且献上了威尼斯水晶三棱镜。总督虽对此赞不绝口，却拒绝留下，因为他害怕遭到弹劾。不过总督要利玛窦为他制作一个日時計和一座测象仪，还要他把“局部记忆功能”的秘诀写下来供他的三个儿子阅读。当利玛窦提出想在南昌居住时，总督爽快地答应了。利玛窦虽高兴得心狂跳不已，但仍礼貌地结束了他的这次值得纪念的晋见。

不久，利玛窦就去拜会最显贵官方人士：布政司、按察司、提学、知府。对知府以及知县，他都说总督大人已口头恩准留居。这些人不敢享以闭门羹，都乐意效法总督大人予以接待。为了感激王继楼，利玛窦也给他送了一份厚礼。

总督大人的接见之后，来找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其中一些找他是为了寻求化朱砂为白银的诀窍。利玛窦受到高人雅士敬重的最大原因，在于他同书院院长、鸿儒章斗津结为知己。章斗津年近70，学富五车，远近闻名，但从不猎取功名富贵，醉心于著书立说和

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给利玛窦以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利玛窦也常去章斗津主讲的豫章书院和章的300多学生交谈，发表他的见解。这种聚会吸引了大量听讲的人，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生员前来南昌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的时候，这些人均以与利玛窦叙谈为荣。利玛窦把来拜会他的人分成五类：一、来瞧洋人的，这个洋人天生美髯公，懂汉字，知中国习惯和礼仪；二、谋求第五感官的炼金术士；三、科学之友，他们把他看作“又一托勒密”；四、许多人来寻求得救；五、对局部记忆好奇心强的人。让利玛窦感到不满足的是对天主教感兴趣的人太少了。

大约在1595年8月29日以前，瞿太素的亲家建安王派人请利玛窦光临王府。利玛窦和建安王也甚为投机，王爷赔予名帖和扇子，次日又让长子代他赐宴。又次日，利玛窦送去一具水晶三棱镜和一幅画得极为精美的圣母像。王爷很喜欢这些东西，并且称赞欧洲科学、绘画和数学工具。后来利玛窦还送给王爷精美油画、日晷、刻有汉字的地球仪和测量用的四分仪。王爷不仅经常请利玛窦吃饭，而且还赐予银两和家具用品。王爷和利玛窦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601年王爷逝世。

由于建安王与利玛窦常有往来，同处南昌的另外

两位王爷乐安王和弋阳王似乎也想与利玛窦交往。不过最终与利玛窦打过交道的只有乐安王。

在与王爷们交往的同时，利玛窦仍然通过王继楼医生促请总督颁发了官照，允许再来一位神父算作他的伙伴，来一位修士算作他的弟子。担任澳门公学神长的孟三德神父命令等待进入中国有四五年之久的苏如汉神父来南昌，罗如望神父去韶州居留地与郭居静作伴。圣诞节前夕的1595年12月24日，苏如汉和途经韶州时带来的马蒂内修士一起到达南昌。

这时利玛窦又遇到了另外两个困难，一是经费紧张，二是要官方承认神父们的居留权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孟三德神父好不容易才为利玛窦凑齐全年必不可少的最低款项。而苏如汉的到达又引起了不少议论；另一方面，贪求炼金秘诀的人们对利玛窦的拒绝感到失望，以为王继楼之所以偏袒神父们只是因为他已经获得这个仙方。为了摆脱被动，利玛窦又携横置日時計一具、地球仪一架、几何四分仪一个等礼物去拜见总督。这位高官非常满意，随即命令他的同乡南昌知府具体办理。但知府胆小，想把神父们赶回一座寺院里去，利玛窦拒绝后，知府就再也不愿给予书面批准。利玛窦只好又带上由总督的几位公子译为中文的关于局部记忆的论文和一串海马牙齿制、用银丝穿

起来的念珠以及一座自鸣钟去拜见总督。总督两次许诺运用权威督促知府为传教士们出力，但谈及事情本身，他说书面执照并无必要。求见总督之后，利玛窦又带上两具急就制成的、值许多银子的日晷去拜会知府。知府一应俱收之后，又馈赠超出礼品价值的银两。利玛窦这时已经认识到如果不请求可能给官员带来风险的书面文书，官员可能给予更多的照顾，而他们本身又少担风险。

一旦利玛窦明白过来形势对他有利，他就立即着手找房子。多方谋求之后，找到了一幢地势很好、但不太宽敞的房子，并且极其隐蔽地成交了。1596年6月28日，利玛窦又以最快的速度搬了进去。买下房子以后，利玛窦又逐一拜会南昌城各位要员，分送来自澳门的薄礼。利玛窦的考虑是免得日后必须超出力量送礼。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感到他在南昌建立的居留地地位已经巩固了。这样，耶稣会在中国的南昌和韶州有了四个神父和两位修士。

鉴于南昌的现实状况，利玛窦决心至少暂时不谈自己奉行的宗教，仅作为“西学”的代表出现，更加广泛地介绍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南昌也像在肇庆一样，利玛窦经常展示欧洲出产的珍奇之物，并向若干显要人物出借，如三棱镜、

精美的油画、若干金边精装有插图的书藉。但书库的藏书并未丰富起来，因为赣江上发生的沉船事件使利玛窦丢失了一部分书藉。罗明坚虽答应寄一部《古罗马》和若干建筑学书藉来，但事实上并没有。而其他入供应教团的书籍在半路上遇到的障碍太多，不仅英、法、荷各国海盗抢劫船只，果阿、澳门的耶稣会士还要截留或改发日本。

南昌虽没有人能像瞿太素那样学习理论数学，但也有几位科学新奇事物爱好者。利玛窦为他们制作了几具日時計，上面刻有关于时间流逝的美妙格言，还制作了几具地球仪、天球仪、几何四分仪等。利玛窦把数学运用于天文，也吸引了相当多的观众。他给中国人讲解托勒密学说和月食、日食。鉴于在肇庆印的輿地全图错误百出，利玛窦把文字说明加以修改，让建安王拿去出版发行。

利玛窦虽享有科学家的盛誉，但当时的中国人更多的是热心于研习经书、史书和作文，以图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对这些人，利玛窦又多次表演他神奇的“局部记忆功能”，并且收下了几名弟子。不过当他的关于局部目视记忆法的论文问世以后，又让很多士子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以不费力气而记忆力增强的窍门。但仍有一位钦佩利玛窦的人把其论文刊印出

来了。

南昌的一个特点，似乎是文人结社甚众，道德宣讲师也很多。这类会社或书院有的弟子或会员达数百人，但通常以10人左右小组活动。利玛窦凭借他的哲学素养震撼了中国人，他又一次到处受到邀请，请他谈论一切道德问题。如饥似渴的听众视他的言论为至宝。利玛窦撰写了有76句格言的《交友论》，为了增加吸引力，他在正文后边附上他自己创造的汉语拉丁化方案，再加上一篇序言，然后听任索取者拿去翻印，甚至随时提供现成的汉文译述。《交友论》被赣州知州偷偷拿去付印，但未附有拼音方案。书中的一些言论还被直隶、浙江等地区的一些士大夫们在著作中加以引用。

但对于利玛窦来说，不谈及宗教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时的利玛窦对儒、释、道三教在中国的地位及各自的教义已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为了传播天主教，他在章斗津主持的豫章书院里多次与人辩论，利用儒家学说证明基督教教义符合中国古代一切优秀传统。下面的一段话准确地反映了利玛窦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虽然儒家拒绝谈论超自然真实，但在伦理教诲方面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我一开始就利用这一教派来攻击其他两教（佛教和道教）而不驳斥儒

教……我们要是以蓄意的言词武装自己，同时打击三教，那就会处于非常麻烦的境地。”

要完成与士大夫书院或讲堂合流，尚需迈出的最后一步是远远抛弃可能使传教士们混同于和尚的一切，即取消公开的小教堂，免得使居留地像个和尚庙。韶州发生的事故更使利玛窦下定了决心。由于韶州人把居留地看作寺庙，而寺庙在中国是可以自由出入的，但韶州居留地的神父们不让当地人随便进入居留地，以至发生纠纷而对簿公堂。官司虽然最终体面地了结了，但对于传播天主教的消极影响却很大。于是利玛窦在南昌不再开教堂，宗教仪式只私下举行。他像一些宣讲师一样开始设立了讲堂，变说教布道为交谈。

就这样，通过交谈和以身作则，利玛窦的“西学堂”的美名与日俱增。1597年5月有1万人来南昌应乡试，12月有4000人应会试。这两次来居留地拜会的人不可胜数，以致于利玛窦不堪负担。

这时的中国已被利玛窦打开了一个缺口，15省中有10省都有传教士的朋友。尽管如此，利玛窦念念不忘的想尽可能更快地确实获得万历帝的正式庇护，以便把传教团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上。利玛窦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教皇派使团来中国，但希望一天天渺茫，利

玛窦只好自己就地想办法了。

范礼安神父又一次给予了利玛窦决定性的帮助。

1596年底，范礼安卸去了承担22年之久的印度及远东视察员职务，改任中国和日本视察员，权力虽然缩小了，但使他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中国传教事务。他于1597年7月20日抵达澳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1、任命利玛窦接替年老多病的孟三德神父为来华传教团教长，扩大其权限，让他得以作出他认为有益的决定。

2、指令利玛窦寻找一切渠道进京，并从澳门给他送来了可以当作赠送皇帝礼物的物品：一幅从西班牙来的圣母像，一幅救世主像，一座中等大小的青铜自鸣钟，以及能够搜集到的其他有用之物。

3、任命李玛诺为澳门神长，负责供应来华传教团的一切必需品。

4、派遣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神父去韶州居留地。

有了充分权力之后的利玛窦继续在南昌窥视一切可以进京的机会。不过最开始利玛窦找错了人，他原以为建安王会为他进京面圣出力。正在这时，听说前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从海南被召回任所。利玛窦立即

派人送信给郭居静，请他于大人途经韶州时前去拜会。郭居静见到王忠铭后，禀告利玛窦现在南昌，并请求随王大人前往南昌，去同利玛窦合作采取必要的步骤，改革历法。郭居静安排龙华民担任韶州居留地教长，自己和罗如望神父携两名申请入教者昼夜攒行，于1598年6月23日抵达南昌，比王忠铭早二天，以便作好一切准备，可以迅速出发。

王忠铭到达南昌以后，利玛窦请他观看棱镜和准备献给皇上的贡品，还送给他几件欧洲珍物。王忠铭对贡品赞不绝口，主动提出带利玛窦晋京祝贺万历寿诞(1598年9月17日)。利玛窦正求之不得，便带上郭居静神父、费南德斯修士等人，留下罗如望神父和苏如汉神父看守南昌居留地。由于没有时间，也担心本城官员找麻烦，启程前不会客，也没有搞官照。6月25日，利玛窦离开了南昌，一去不复返。

没有几日就抵达了南京。利玛窦趁旅途之便，全力和王大人、王大人的仆人、儿子，尤其是其舅父姓晁者搞好关系。这位娘舅大人后来至死都为神父们说话。不幸的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战事再起，南京城里正搜捕奸细，所以利玛窦无法在岸上找到地方住，只好不顾酷暑，与伙伴们一起呆在租来的小船上。

尽管如此，利玛窦还是乔装坐轿子前去拜会保护

过他的各位要员，但他刚一出去就被哨兵识破了。幸亏都司冯钦侯对这位与许多显贵有交往的洋人行踪没怎么盘问就放他过去了。在南京期间，利玛窦通过王忠铭又结识了总督赵可怀，并结为至交。

当时的万历宫廷里，宦官已开始专权，为非作歹，宦官与朝臣的矛盾和斗争也逐渐升温。矛盾和斗争使为官较清正者都有前程突然断送的危险。利玛窦此时的保护人王忠铭就是如此。所以他劝利玛窦只献一座自鸣钟给皇上，另一座留下来送给宫中一位有权势的宦官。利玛窦却宁愿把它送给王大人自己。事实上这一招很高明，因为王忠铭唯恐为这个洋人过分牵累，已经开始考虑卸去这样沉重的包袱。只是由于受到家人的撻掇，而且他眼见众多官员被洋人的盛名和贡物所吸引，所以未敢对利玛窦失信。不过利玛窦在南京如果过于名显，就不能不招致物议；过于隐居，就不能不引起怀疑。这样暧昧的处境，久而久之，会是异常危险的。于是王忠铭在8月底以前决定走旱路，较快去北京，让利玛窦及其三位伙伴乘快舟前往，这船由两名仆役押运行李进京。

一路上，利玛窦既受到了太监的刁难，也因夏日酷热，旅途漫长，又绝对禁闭在舱内，加之在南京饱受惊骇，因此利玛窦和郭居静先后病倒，好在不久又

痊愈了。不过他们也见识到真正的运河仅仅是一系列的废河道、湖泊、沼泽，一段段河区相连，河闸型式非常特别，几乎到处都保持着河道弯弯曲曲、宽度各不相等的河流模样。

神父们一路小心谨慎，所以到处顺利通过，甚至在天津也未碰到麻烦。沿途他们还依据太阳的高度测定各城市的纬度，并测定各地水道距离。

1598年9月7日，利玛窦在北京港通州起岸。他们的保护人王忠铭已由旱路先期抵达京城，他们就立即前往拜谒，利玛窦和郭居静由王忠铭安排住在城里，两位随行的修士住在郊区属于王忠铭的寓所里。此前王忠铭已听说他将升任北京礼部尚书，但一天天过去了，始终不见正式任命颁布。于是王忠铭决定向一位答应过为洋人说项的宦官去说说，并邀请太监到城外分馆去玩，检视贡物。这位太监对利玛窦的贡物非常满意，但见他们绝口不提朱砂变白银的炼金秘诀，便开始拉长了脸说：目前引他们见皇上不怎么合宜，因为倭寇威胁着中国，中国人又不太懂得区分洋人，是不会接纳他们的。

王忠铭听到这样的言谈，也听到朋友们的劝告，又由于对迟迟不见正式任命在京就职感到失望，而他自己必须在规定的期限离京，所以他想立即打发利玛

窦一行重返南京。利玛窦却不甘心这样快就服输，还想千方百计赖在北京不走。结果只是屡屡失败，带来的银票是假的，兑不到钱就没法租房子；利玛窦的当了京官的朋友却不肯接见他，持王忠铭八行书求见的人也都回避见面。利玛窦想定居北京的理想化为了泡影，只好怏怏不乐地赁舟驶返南京。

当然，这次北京之行也并非全无结果。且不论神父们对于中国真正治理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还北京和沿途大城市的纬度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测算，作为一个重大的地理发现就是辨明了马可·波罗所说契丹和中国是不是一回事。最显著的成绩是在往返途中，利玛窦和郭居静修订完成了一部以后成为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基础著作。他们分清了声调和清浊，然后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规定后人都必须这样读和书写。这一方案虽不太完善，但利玛窦开创了汉语拼音化的先河。在旅途中，利玛窦还修订完成了《四书》的翻译和诠释，对初学者来说帮助很大。似乎也是从这时开始，新来的传教士不再文言和白话同时一起学，而是先学口语，再学书面语言。

第四章 再次向北京进发

利玛窦是1598年11月5日离开北京的。由于时近冬天，河面开始结冰，船到山东临清已无法再走。利玛窦不愿白白浪费四五个月宝贵的时间，也为了避免其他的危险，决定留郭居静看行李，自己带两名仆人，取道徐州、扬州走旱路。时值严寒，骑马极为辛苦，以至两次得了严重的痢疾。江南的气候不像北方那样严酷，从镇江开始原也可以再走水路，但这段运河太窄，船太多，舟行过于缓慢，利玛窦只好放弃，雇了一辆手推车，勉强在一侧安一条板凳坐上。到达苏州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但没有比瞿太素的款待更热诚的了，几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位儒士虽身居寺院陋室，仍对利玛窦供奉不遗余力，就像孝敬父亲一般，把床让给他睡，自己睡地铺，还花了许多钱办招待。利玛窦为了聊以补偿他的辛苦照料，赠给他一具他渴望已久的三棱镜，他就拿去配上一个银匣，匣子两端珠扣还穿上两条金链。当有人向瞿太素出高价想买它时，他说要等利玛窦向皇上献了方物之后才能卖，因为他担心买主抢先献给万历帝而使利玛窦的贡物价值贬低。两年之后，瞿太素卖掉三棱镜还清了许多债

务。

苏州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使利玛窦觉得苏州是他继续学习、准备渗入中国文明的最合适之处。瞿太素及其亲友也一致主张利玛窦不要到南京去定居，虽然南京近在咫尺，但疑心多端，况且大官太多，只要得罪了一位，就有被驱逐的危险。于是利玛窦决定到南京去只是去取王忠铭和其他几位朋友的八行书，便于向苏州的官员引见，至于任何邀住之请，都应拒绝，哪怕是什么显贵搞到房子，也不能答应。

这时阴历年(1599年1月27日)将近，鉴于中国人都忙于过年，利玛窦就走水路去镇江，受到镇江知府王应麟的热烈欢迎。利玛窦由许多高人雅士陪着在镇江过了年。年后，王应麟又用官舟送他去南京。1599年2月6日，利玛窦又一次来到了南京城。

利玛窦在南京，再次受到礼部尚书王忠铭的热情接待。整个南京城都在谈论王忠铭带利玛窦去向皇上献珍物，人们认为此行未获成功是由于抗倭战争。很多人想一睹方物，尤其是自鸣钟。

利、瞿二人寄寓旧城中心，内桥东南不远的承恩市。随即，瞿太素的朋友纷至沓来，他一如往常不住口地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谈论利玛窦和利氏带来的东西。过了几天，王忠铭便要利玛窦在附近买一栋房子。

这虽有违利玛窦来南京的初衷，但他还是宁愿保持沉默，不让王忠铭扫兴。2月10日元宵节，王忠铭又邀请利玛窦到他府邸过节。礼部尚书给予利玛窦闻所未闻的礼遇，大大提高了利玛窦的声望。南京国公、五军提督、太监头竞相邀请他。礼部侍郎叶向高也和利玛窦结为至交。与利玛窦来往的要员主要还有刑部的赵尚书、王侍郎以及户部尚书张孟男及其侍郎。王忠铭还把日后升为北京礼部侍郎的郭祖乾和翰林杨景淳带来相见。

面对这些人的厚意挽留，利玛窦只好暂停考虑去苏州定居之事。南科道都给事中祝石林的口头许诺打消了利玛窦定居南京的最后顾虑。

于是，神父开始找房子，先还只打算暂时租下，想试试看有没有人阻挠居留。当利玛窦准备买房子时，王忠铭想把空着的侍郎公馆让给他住，但利玛窦担心招致非议，只肯借用家具。新居启用之后，宾客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当时的名士李贽。李贽当时已年过七十，愤世嫉俗，故而削发为僧。他对官商爵显者都不屑于拜会，却和利玛窦来往甚密，互相讨教。他还命人抄写利玛窦的《交友论》多份，分赠在湖广的众多弟子。

利玛窦在南京进一步研究儒教。祭孔日的前夕，

礼部尚书王忠铭把他带往南京天坛目睹次日祭孔典礼预习。天坛的结构和象征使他对中国宗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利玛窦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抬高儒家学说的同时，他对道教和佛教进行批判，而西方科学使他的这种批判更加有效。为了让别人相信天主教教义和孔子学说是一致的，利玛窦结识了当时的大儒厉汝进，并和厉汝进本人以及厉汝进请来的高僧三槐进行了多场辩论，辩论以利玛窦占上风而结束。

利玛窦名望与日俱增，数学仪器在南京城广泛传播，北极阁小山上的观象官员为了保住饭碗，就亲自来拜访利玛窦，并和利玛窦达成了互不相扰的协议。利用这种机会，利玛窦得以观赏元代郭守敬制作的、已经没有人懂得使用的绝妙天文仪器。

应一位显宦吴左海之请，利玛窦把舆地全图以官费付梓。这个地图的印本在全国各地，以至澳门、日本广为散布，还成为其他版本的原型，例如，贵州巡抚郭青螺就以缩小的尺寸加以复制。

利玛窦虽然下决心谨言慎行，但他的成功日渐使他引起公众的注意。利玛窦就更想建立一个巩固的居留地，把自己置于皇帝恩庇之下，不牵扯挑起民众运动的嫌疑。另外，郭居静神父押运行李迟迟不见回来也使他放心不下。因为援朝抗倭战争结束后，国库消

耗殆尽。为了弥补亏空，万历帝下令开放若干金、银矿，还对全国所有商品征收2%捐税。但执行命令的太监却是到处设关卡横征暴敛，对富有者敲诈勒索。利玛窦整日提心吊胆，深怕滞留在临清的行李途中被没收。好几个月之后，1599年4月21日，郭居静和修士平安抵达南京，途中未遇麻烦。

郭居静神父平安归来之后，利玛窦继续找房子，盘算如何才能获得留居南京的正式许可。像南昌一样，南京的官员也都拒绝把责任揽到自己肩上，但由于利玛窦坚决请求，其中有些人开始考虑了。不久，工部尚书刘斗墟向利玛窦说起他为户部官员盖了一幢房子，可因为闹鬼，两三年都没有人敢住或购买。因此刘斗墟准备将房子卖给利玛窦，价钱随便。利玛窦一看房子宽大，地势又不错，就买下了。当利玛窦迁入新居之后，刘斗墟签下一纸正式文契，并吩咐在门前张贴告示，加盖户部大印。晓谕保护。就这样，居留地问题迎刃而解了。

定居之后，利玛窦考虑是否该陈列拟进贡皇上的方物。为避免过于招摇，决定仅陈列几天。不料来看的人不计其数，不但本城的人，周围附近的人都跑来参观。只10天的功夫，神父们和仆人都疲惫不堪，而来看的人有增无减。最后，利玛窦下了决心，把两

幅圣像和三棱镜庄重抬往正好负责看管贡物的朱石麟家中。朱大人先是推三阻四，不愿承担责任，后来才勉强同意把圣像供在净室。

利玛窦经过对时局的分析，决定来年一定要再去北京，争取向万历进贡。他认为中国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局势已基本平静，官员们给予他们的照顾也比以往要有把握得多。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如果无法直诣皇上，不能设法定居北京，南京居留地本身就不能安全，况且，贡物已经美名远扬，太监在两京之间往来不绝，很难说消息不会传到万历帝那儿。与其让万历下旨索取贡物，还不如自己先送上去。于是利玛窦决定由郭居静把自鸣钟携往南昌，躲开民众的好奇，然后直接赴澳门，和在澳门的传教士们商量，并在澳门补充银两和欧洲方物。大约7月底或8月初，郭居静偕塞巴斯蒂安·费南德斯修士前往南昌，然后独自前行去澳门。

利玛窦和马蒂内修士留在南京继续以温和手段传播教义。名流显贵来的仍然很多，其中不少是来请教数学或伦理科学。为了应付络绎不绝的来宾，利玛窦只好豁出性命去周旋。他尽量一大早就吃饭，好在他的身体还能顶得住。李之藻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利玛窦的。

与此同时，利玛窦渐渐改变以往的含蓄态度，公开宣扬天主教教义。他编写了一本格言集，以后出版为《二十五箴言》，成为他最大的文学成就之一。利玛窦还有一个最经常的活动，就是散发来自欧洲或在日本复制的版画和绘画。虽然通过日時計以及其他各种奇巧之物，基督教学说日益渗透到知识阶层，但利玛窦在给耶稣会总会的信中说：“我们目前在中国还不到收获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文明帝国……我们眼下有困难，就是，他们极少、也不愿同外国人交往。……我们非至直诣皇帝之时不会有新的扩展。”

事实上利玛窦一天也没忘记第二次向北京进发。他先是认为南昌的建安会向负责在江西省征收新税的那个太监说情，苏如汉就去见他，于是王爷颁给官照，准许利玛窦携贡物前来会合苏如汉，共同拟定给皇上的奏折。不料建安王派往南京的仆人半道上不见了，以后就杳无音信。以后，南昌的神父继续长久谈判晋京之事，但利玛窦已改变主意，对太监不予信任，就谢绝了王爷的斡旋。

这期间，郭居静神父在澳门也没闲着。他凑齐了一笔钱，足以支付三个居留地的维持费、南昌所欠债务、晋京路费、南京的购房费用。他还搜集到了许多进贡之物：一座小自鸣钟，高可盈掌，青铜镀金制成；

一座镀金铁制大自鸣钟，因露在外面的钟摆响声更大而更受欣赏；三幅画，两幅大的约五掌高，其一为圣母像，另一为圣母怀抱耶稣同圣约翰在一起，还有一幅小些，画的是救世主；两具威尼斯三棱镜；一幅奥尔特琉斯的《世界全图》；一本精装《每日祈祷文》。还有几面镜子、若干书籍、若干其他珍物以及羽冠饰、细麻布精品、沙漏计时器、玻璃器皿等，这些是用来打通关节的。

1599年10月底，郭居静和庞迪我二位神父从澳门前往广州。11月1日晚上，他们穿上中国服装，郭居静已蓄长发留须，但庞迪我尚未能全盘随乡俗。他们悄悄匿身于舟中，向南京进发，于1600年初驶抵南京。利玛窦早已在盼望他们的到来，但在南京传教士过多迫使他们很快决定谁陪利玛窦北上。最后决定：郭居静留南京看守，从南昌调来罗如望协助，新来的庞迪我则随利玛窦进京。为有助于进京，庞迪我出发前的四个月时间用于向郭居静学习弹奏洋琴。与此同时，利玛窦毫不延搁，立即把新近运来的小礼物分赠可能有助于自己的人士，谋求照顾，瞿太素原不住南京，也特意从浙江赶来小住数日，帮助出谋划策。为了路途顺利，他们决定争取高官颁发官照，最后朱石麟主动提出由他自己颁发官照。礼部尚书王

忠铭已于1599年底前后回到海南岛。不过他和其他几位官员一样，给利玛窦写了八行书拜托他在京城的朋友。

最后，有位叫娄布雪的太监负责五六艘快舟运载绸缎进贡皇上，他允许神父免费乘船。为表谢意，利玛窦为他向官府求得某一恩典，利玛窦把受托保管的玻璃器皿留下一件，赠与朱石麟作为礼物。南京的能工巧匠为那座铁制大自鸣钟制作了一具钟匣，匣框上精雕细刻着枝叶花卉，盘以好几条龙，整个钟匣全部镀金。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随太监的小船队从南京启航。这一次，神父们在整个航程中不像上次一样尽量地躲起来，不让人发现，而现在他们尽量装出重要人物的模样来来往往，舒舒服服地住在两间官舱里，所带之物为设置新居留地所需一应俱全，甚至包括装饰小堂的东西。每到一站，他们都下船，上岸去拜会官员和士大夫。娄布雪则常向人谈及神父和他们送给朋友的礼物，甚至在过关卡时，别人有时要等到四五天才能轮到，他往往能得到其他船队的同意，先于他们过去，因为他运送的是进贡的珍物。

一路上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利玛窦和庞迪我就利用这种机会，宣扬天主教和此行的目的。在南京和山

东省交界处的台儿庄，有位官员到船上来拜会利玛窦。神父趁此机会把救世主像和圣母像拿给他看。交谈到最后，这位官员竟说：“如能面圣进言，务请奏明君等之教，促圣上多施仁政。”见庞迪我闹胃病，他次日再次光临，带来他配制的一剂膏药。这两个洋人受到最好款待的地方，大概是山东商埠济宁。仓运督办驻节于此，品秩相当于侍郎，当时任职的名叫刘心同，山西人氏，常听儿子和李贽言及利玛窦。当时李贽就在济宁，住在侍郎隔壁。侍郎从李贽处得知利玛窦来了，立即派轿子和护从去请。利玛窦在侍郎处盘桓了几天，侍郎命人为利玛窦重写了一份表章，修正了在南京写的表章的不够妥贴之处。然后，刘心同又修书数封嘱托在北京的朋友，请他们设法帮助利玛窦。利玛窦在济宁停留的时候，船队仍然前行，所以刘侍郎又派人护送利玛窦追赶船队，直到赶上那位太监。

7月3日，利玛窦一行抵达山东临清，麻烦也就开始了。万历在临清安置了一名叫马堂的太监来收关税。马堂凶狠、狡猾，在临清作威作福。头一年一大群士卒造反反对他，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的许多家人，他自己化装才得以逃脱。但事后马堂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押运船队的太监娄布雪和马堂谈判了两三次，想

付一笔买路钱过去，索价却越来越高，终于未得结果。由于娄布雪害怕延误抵京，就下决心出卖神父，他向马堂的心腹透露洋人带了贡物，是中国从未见过的，还极其秘密地让他们看了拟献之物。这正好点燃了马堂的贪欲，他希望得到一块宝石，还想把献贡物的功劳归于自己。利玛窦也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就向在肇庆结识的、此时任临清附近各城总管的全华洛求助。全华洛虽很愿意帮忙，但他对马堂也无可奈何，只好劝利玛窦息事宁人，要感谢马堂的照顾，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受害的程度。如若闪烁回避，有害无益，甚至有危险。这种策略，在当时也是最实际可行的。不过全华洛还是尽量为利玛窦减轻压力，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官府要人吹捧利玛窦，让这些人为利玛窦送行，好让马堂知道神父们在全中国多么受到敬重，以致不敢造次。

马堂乘着豪华的官舟来拜访利玛窦，利玛窦率众人赶紧出迎。贡品搬到马堂船上之后，太监对圣像叩头，向圣母保证一定让她在皇宫有合宜安身之处，并许诺立即把神父们的表章急速发往北京。利玛窦婉然谢绝，说已有若干要员答应鼎力相助，但马堂不屑一顾地说，“皇上才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哩，会把他们所奏始终压着不管的”。利玛窦一听，马上极其谦卑地

感谢神通广大的马堂如此令人喜出望外的厚爱。但当马堂提出要把贡品存放在岸上他自己的官邸里时，利玛窦就推说自鸣钟时刻需要保养，至于圣像，必须在他自己身边才好供奉并时刻祈祷。

接着，押运小船队的太监娄布雪未付厘金就独自走了，似乎为了表示歉意，他把一名在南京买的小奴仆送给神父。这个小奴仆官话说得好极了，以后成了庞迪我学官话的老师，教得非常好。

娄布雪走了以后，利玛窦一行迁至马堂的一艘大船上，这艘大船预定在一个月后把过去六个月所收税款解交天津卫要塞。马堂不时施以小恩小惠。例如，有一天，他邀请神父们光临其官邸，由其他几位显要太监作陪，设盛宴和戏剧、杂技款待。

7月12日前后，马堂停止升堂理事，也不再出门办事；7月15日前后，他命两名精于写表章的高手按传统仪式草拟奏章。奏章一式两份，都用黄绫装订并以黄绫为面和底。马堂盛装亲自送将去北京呈交奏章入宫廷的仆人至大门以外，同时鸣炮一响告知全城这一重大事件。

不过，马堂发现他得到一颗宝石已经无望时，积极性也就越来越消退；但他还是乘着八抬大轿，全副排衙，鸣锣开道，前来为利玛窦众人送行。利玛窦

和庞迪我大约在7月18日启程，五六天后抵达天津（7月23日或24日）。一路上如同官员出行，有肉、鱼、果、酒的供应。马堂的手下人继续前往北京。原认为万历帝最多二三天就会有御旨下来，但两个星期之后，当马堂亲自押解8万两关银来到天津卫时，北京城仍无消息传来。马堂又派一人去北京了解情况才得知，由于按惯例进贡事宜应由礼部主客司处理，但马堂的心腹们偷偷摸摸地行事，想独占好处，所以以皇帝名义写批示的人对马堂的奏章不予理睬。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马堂由于只获知京城方面对他所奏其他问题的答复，于是开始对自己多管闲事后悔不已。他不再邀请利玛窦等人去他官邸。他派了六个人到他们船上站岗，借口是保卫他们，实际上是监视。利玛窦也无可奈何，前进吧，没有御旨是不可能的；后退去南京吧，也是被禁止的。因此利玛窦只能祈求上帝保佑。

就这样，一直等到10月底，利玛窦翘首盼望的钦差才来到。天津的大小官员和利玛窦一起跪听圣旨。万历帝下令利玛窦再写一奏章，说清楚所有带来之物。马堂立即登上神父们住的船，要他们亲手拟出清单，一再强调不准隐瞒任何贵重之物。不过利玛窦提供的清单又让马堂大失所望。由于内廷的太监们和礼部之

间的明争暗斗，利玛窦的奏章又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冬天就要来了，河水即将结冰，与临清的水路交通眼看就要中断。马堂告诉神父们，他们住的船要调用。于是利玛窦等人携贡物搬到了天津城内一座花园中居住。这使传教士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做弥撒了。

马堂始终怀疑利玛窦有宝物隐瞒未报。在他返回临清之前，他和兵备道带着200左右兵士来到利玛窦一行的寓所。马堂想讹诈，就故意大发雷霆，吼叫道，北京有人写信告诉他：利玛窦藏匿了许多宝石，不想献给皇上。马堂命令利玛窦把行李——四五只箱子搬到天井。他继续大声吼叫，一一仔细查验行李，只要发现有什么东西是未曾给他看过的，他就发疯似地悲鸣，仿佛看见了被抢走的宝贝。马堂把他喜欢的东西都放在一旁。当马堂在庞迪我神父的一个匣子里发现有个木制耶稣死难十字架时，他脸上露出怪相，手足狂动不已。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裸体是不允许出现的，而且十字架上面的血漆得就像是快要滴下来了。于是马堂指责利玛窦是要用蛊术加害皇上。利玛窦向他详细解释，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不过，后来发现还有好几个十字架，刻的、画的都有，疑心也就慢慢消除了。

检查完毕之后，马堂先把一个装有200多银币的口袋还给了神父们。神父们请求马堂把做弥撒用的银制圣杯还给他们。一开始马堂不肯，直至利玛窦允许马堂拿双倍甚至更多的银币时，马堂才交还了圣杯。除此之外，马堂把放在他身边的东西：绉纱衣服、整匹印度棉布、玻璃器皿、日计时、沙漏计和其他物品，总共40来件，连同头一批贡物一起，统统封存在堡垒的财库里，只给神父们留下大钟和大画像。而且临走之前，马堂还骂骂咧咧，扬言要向皇上揭发洋人，皇上会惩治的，至少要把他们驱逐出境。两天之后，马堂离开天津，返回临清。神父们无依无靠，住所又黑又不方便，而且时时刻刻内外都有兵看守，甚至他们的仆人没有两人押送也不得外出。神父们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只好做弥撒以保持心理的平衡。

到1600年12月，情况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晋京看来已无希望。但事情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601年1月8日，出乎意料之外，万历帝下旨，命令神父们携贡物立即晋京，由一名官员护送他们到北京以后，由礼部按惯例处理。

至于皇上在过了6个月之后才突然下旨，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皇上独自一人，忽然想起曾有人上本说及有几个洋人要送他一架自鸣钟，皇上就

叫道，“这个自鸣钟，怎么还不给朕送来”？当值太监启奏道：“皇上如果不赐下马堂的奏折，洋人怎敢擅自进京？”皇上这才批下马堂的奏折，随即命人告诉马堂。马堂虽非心愿，也只好服服贴贴，吩咐把献给皇上的贡物发还神父们。

由于利玛窦所携物品有些被马堂公开没收或赠送给了兵备道，所以发还给神父们的物品比原来要少，好在损失不大。利玛窦也准备不再追究，但当他发现携带的所有数学书籍都不见了时，他就向看管物品的小吏索要。实际上这些书已被马堂另行收藏，放在一口专用箱子里，贴上封条，写道：“税监管事马堂自西夷利玛窦行李物件中查获之书，按我皇明律令，禁止此类数算之书，故封存于天津卫要塞库内，待另行奏明圣上发落”。由于小吏不识字，便把箱子也还给了利玛窦。稍后马堂押送税银回天津卫，同时办理神父们晋京事宜，先还没注意这件小事。神父启程之后，才发现书不见了，便大发雷霆，痛斥要塞的官吏。他装出好像是皇上要这些书的样子，命那名笨拙小吏去找回来，此人吓得要死，便逃之夭夭了。马堂自己也心惊胆战，从此绝口不提，也不许别人再提。也幸亏如此，因为这些书后来对于利玛窦在北京传教大有好处。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0日从天津启程。天津至北京四天路程方便得很。1月24日利玛窦抵达北京，下榻于南城外一名太监家里。从此，利玛窦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直到他逝世。

第五章 在北京的岁月

“北京”这个名字对利玛窦就有无比的吸引力。头一天，他刚从光秃秃、灰蒙蒙的草原上远远望见萧索的树梢巅上升起了巨大城墙时，他心中无比激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是啊，18年了，他终于接近了中华帝国的核心。虽然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也相信，他的有生之年将在北京度过。

利玛窦一来到北京，就知皇上已命礼部处理他们的进贡事宜。所以利玛窦赶快抢在礼部来人之前把贡品打点好，开列礼单，并附上了奏章：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 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 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此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喑哑，因僦居而习华文，淹留于肇庆韶州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人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诣。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

“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

珍珠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来，差足贵异耳。臣自幼慕道，年齿逾艾，迄未婚娶，都无系累。他咋所望，谨此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恚来归，将所献之物俯赐收纳，则盖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忱应少伸于万一。

“仰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必敢也。

“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敕令引见献异物者的圣旨前已由总理夷务的礼部下达马堂。但这个太监唯恐坐失贡献异物的好处，赶紧采取措施，在他们抵京的次日凌晨，就派出大队人马，或步行，或乘骑，慌慌张张，携贡物、奏章、税银，穿城而过，直诣皇宫。而利玛窦及其伙伴们始终被禁闭在马堂的亲信太监家里。

皇上御鉴奏章之后，传旨呈上贡物。皇上一看到天主像，就脱口而说：“这不是活菩萨吗？”从此，那些像就保留了这个名字。宣召神父们时也说是传“那些呈献活菩萨者”。不过，万历帝对威尼斯三

棱镜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倒是自鸣钟有幸给这个幽居的专制君主的单调生活排遣了一段时间的烦闷。

第二天，万历帝看到自鸣钟到时未响，很不高兴，就立即下旨宣利玛窦进宫修理。利玛窦和庞迪我骑马赶到皇宫内放自鸣钟的地方，很快就将钟修好了。万历帝的一个近侍太监李齐诺奉旨接待神父，他在200多名其他太监簇拥下客客气气地予以款待，还询问他们进方物为何目的、有何打算，听到他们回说并不为求官，只为信教，唯一的心愿就是侍奉上帝，虔诚生活，无求于尘世，他表示非常满意。说到自鸣钟的调理，利玛窦请求指派一人，由他用两三天的时间教会此人调时所需的一切知识。

万历帝命四名太临拜利玛窦为师，并要求三日后必须将大自鸣钟送至宫内。为了说清楚，利玛窦将钟里面的一切，如齿轮、钥匙等等，都创造出汉译名称。四名太临也学得异常认真，拼命记住关于自鸣钟的一切，为了全无遗漏，还用中文写下一切解释，以免因为小疏忽而遭到万历帝的惩处。

这三天之内以及以后的若干天，万历帝不断派太监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询问有关神父及欧洲的各种事情，例如，风俗习惯、饮食、建筑、君王的衣着、发式、珠玉、婚姻、殡葬等等，甚至对神父们一天饮

酒几次，吃多少个馒头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三天刚过，太监们就将大鸣钟送到宫内，万历帝大为高兴，重赏那四名太监，其中两名恩准每日进入寝宫为皇上调整小自鸣钟——皇上不分昼夜，须臾不离。后来万历帝又下令建造富丽堂皇的钟楼。自此以后，在中国，爱好欧洲钟表、自动人成为一时之狂热。现在故宫的钟表馆里就陈列着几百年来收藏的珍品。

万历帝为保持尊严，不想正式接见利玛窦，但又想见见神父，于是便命最好的画师画出他们两人的立像。同样，万历帝想知道欧洲君主的服饰、发式、宫殿是个什么样子，利玛窦不能当面向万历解释，于是利玛窦画了一幅画呈送皇上，附上汉语简短说明。至于宫殿，利玛窦给了一幅新近从艾斯科里亚来的素描，但太监把它藏了起来，免得详细向皇上解释。利玛窦只好换成美丽的威尼斯圣马可宫。为了向万历说明欧洲君主是如何殡葬的，两位神父以信的形式描述了虔信天主的国王腓力二世葬礼的全过程。

当有太监向利玛窦恭贺他们将获得高官厚禄时，神父们却说不需要，只需一栋房子在北京居住。马堂的手下于是设法在皇宫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派上两名亲信监视神父。根据马堂本人的意见，神父又添上一件贡物：一架本来不是进贡皇上的西琴。于是庞迪我

神父又教四名御乐队太监弹琴。

四位乐师每日盛宴款待二位神父，身居高位的太监不耻下顾，利玛窦和庞迪我也就竭力与皇上的这些近侍维持亲密关系。

利玛窦一如继往一心想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他的宗教。于是借教宫廷乐师弹西洋琴的机会，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他创作了八首歌曲，配上简短的歌词，然后加上一篇出色的序言和相应的拉丁化汉语译文印了出来，很快就以《西琴八曲》为书名在中华境内闻名。

2月底左右，太监们问及神父有何愿望，神父们这时还不敢透露想传播一种新宗教的心意，也不敢说希望再叫些同伴来，只是表示想在北京有个确定的寓所。但马堂一方面扣留了皇上给利玛窦赏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想尽早把他遣回南方去。因此，马堂的手下不许利玛窦拜会京城任何居民，特别是不许拜会正式召他来京的礼部官员。

但利玛窦还是想办法巧妙地绕开了他们的防范。利玛窦借着微服出行的机会结识了刚直不阿的太常寺官员祈光宗，并成为莫逆之交。接着，又有几位士大夫接见了利玛窦，其中就有李贽和济宁那位官员推荐的人。相反，在南京提到过的人几乎都不敢与神父们交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玛窦落入太监马堂

之手，恰恰成为他成功的根源，因为若非这位太监呈上奏折，别人是谁也不敢一试的，利玛窦又会像头一次一样一事无成地回南方去。

礼部主客司蔡惠堂郎中对马堂侵权对待利玛窦，致使神父们不来拜会而十分气恼。他不敢怪罪马堂，全部的愤怒就尽情发泄到传教士身上，下令拘捕他们。3月2日，礼部以利玛窦等人“擅渎圣听，而又逃匿至今不来本署受审”为由，派十多名捕快拘捕利玛窦等人。当时庞迪我正在宫中，捕快们先将利玛窦等人抓起来，然后又守株待兔，将回到寓所的庞迪我逮起来。利玛窦诸人被囚禁在礼部巡检自己的寓所中，门被反锁起来。但负责马堂事务的太监很快就急速赶来，砸开了锁，斥责巡捕及其头头偷了神父们带来的贵重物品，把他们吓得要死，当即纷纷逃遁。不过利玛窦说服了那位太监次日把他们送到礼部。太监先警告礼部官员不得干涉马堂的事情，还扬言要控告捕快的偷窃。但蔡郎中经与几位外郎商议之后，坚称一切将依法办理。

但蔡郎中审问利玛窦时，利玛窦据理反驳，他说自己不能来礼部衙门拜会是由于受到了马堂的控制，而马堂是京中的显贵都惹不起的；另外，他说他已来中国10多年，不应作外国人看待。蔡惠泰无言以对，

只好安慰利玛窦，并许诺要启奏皇上把这件事办到底，不过不能让他留在城里，将在四夷馆拨出房屋让他及其伙伴居住，费用由官府承担。

利玛窦虽然摆脱了太监的控制，但他对官僚能否对抗住太监也表示怀疑，因而他很担心会被赶回中国的边远地区。不过，他还是和同伴们一起搬到了四夷馆。

四夷馆是接待来自中国以外的使节和客商的场所，馆内的房舍足够万人以上居住。利玛窦他们得到了特殊照顾，被安置在馆舍内，馆舍与一般住房的区别就是房内有床、桌椅、家具和被褥。他们还被允许整理一间小教堂，在里面礼拜和做弥撒。馆里的人都对他们很尊敬，甚至馆令召见时也免去他们下跪，甚至还请他们吃饭。利玛窦为了表示感谢，为馆令制作了一些数学仪器，如圆周仪、四分仪等。

到四夷馆后第三天，他们被传去参拜皇帝，更确切地说，是去参拜龙座。天尚未亮，就被召至皇城的南大门——天安门；天刚蒙蒙亮，又随象队一起排成浩浩荡荡的行列，被带进广阔无比、足以容纳3万人的中央前庭。整个仪式繁琐复杂，为了不出差错，利玛窦行前和几个中国穆斯林反复演练。

随后，礼部不断派人来向神父们询问带来了什么

贡物和来中国的意图。利玛窦不愿自己处境暧昧，就如实回答说，到中国来是奉教长之命宣扬上帝律法；想献给皇上一件贡物以示归顺；不要官职，也不要酬赏，只想请皇上恩准他们在北京居住。利玛窦还送礼部郎中一本精致的祈祷书，还有他自己用中文编写的关于天主教信仰的文字材料。蔡郎中只收下了中文材料，把祈祷书退了回来。

但蔡惠泰郎中给皇上的奏折却对利玛窦很不利。蔡郎中认为利玛窦不宜留京，应遣回广州，由地方官押解回国。好在奏章呈上以后久无回音，礼部官员甚至怀疑神父在宫内有太监为之内应。于是一些官员态度有所改变。馆令也一反惯例，允许他随意外出，不过派了四人乔装轿夫来监视利玛窦。利玛窦也得以会见他的朋友，如祈光宗。

过了一个月，万历帝仍无圣旨下达。礼部官员不胜惶恐，再上一本，措词缓和了许多，但仍不提允许利玛窦在京居住。直到礼部的第五次奏表依然如此。这时，利玛窦为保全颜面，就想先搬出四夷馆。由于四夷馆令是祈光宗的门下，所以他要利玛窦写个申请，说自己“有病，要移出馆外就医”。这个手续办过之后，馆令就书面批复，允许利玛窦租居任何民房，每五日派四仆人送去五人所需食物，数量和四夷馆时

一样，还派一下人夜间侍候。1601年5月28日，利玛窦来京四个月之后，终于获得了行动自由，而且由于吃皇粮而享受官方半保护。

利玛窦为了不被再送进去，所以趁管奏章的官员是新近由南京升迁来的一位朋友之机，他又向给万历上了一奏章，乞求在京城栖身。按理说万历该通过礼部给予答复，他却保持沉默。不过，大太监们透露，利玛窦离去的话，皇上会不高兴的。利玛窦也就顺水推舟，在宣武门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住下。

这时的利玛窦感受到了得意之时朋友最多。过去认识，但前一段不愿帮助的人现在又来道喜了，连礼部主管司郎中蔡惠泰都自称是利玛窦最好的朋友。利玛窦有时一天得赴宴两三回，为了不得罪人，他都应邀前往，同时送一些不值钱的礼物，如沙漏计、贝壳盒、小刀等。他给当时的宰相沈一贯送了一个乌木日時計，因而利玛窦前往拜会时，沈相国不仅态度和蔼，还留利玛窦吃饭，又回赠了价值40两银子的礼品。利玛窦和沈一贯的儿子交情也不错，所以沈相国始终庇护利玛窦，直到他卸任为止。

由于南京刑部侍郎王志坚亲临拜会，利玛窦得以结识北京刑部尚书萧某(后来改任刑部尚书)，还结识了当时任吏部侍郎的冯琦。这三位都成了神父的好朋

友，常来神父寓所，尤其是冯琦。冯琦博学多才，在京城深孚众望，不久就升迁为礼部尚书。冯琦利用主客司属其管辖之机，正式批准神父们迁居四夷馆外，并提高了神父们的生活费用标准。为表示谢忱，利玛窦为二位尚书各制一台地球仪和一具石刻水平日時計。地位仅次于宰相的吏部尚书李戴也常来和利玛窦讨论来生之事。利玛窦依据与他、与礼部尚书冯琦的交谈，后来在他的《教理问答》中增写了两章。

与利玛窦来往的显贵当中值得提及的还有来自南京的郭明伦和杨景淳。这两人在南京就认识利玛窦，又一先一后出任北京礼部侍郎。这二人刻意为学，利玛窦为他们制作了地球仪、日時計和其他数学仪器。他们则不时称赞神父学识深厚渊博。

络绎不绝来拜会的人中间，不但有显宦和名士，还有若干皇亲国戚，其护从前呼后拥，还有武将和京城闻人，许多同神父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太监。有一次，大自鸣钟坏了，四位负责的太监没修好，就把它搬到神父的寓所，请神父修理。万历帝知道，下旨以后不许把钟搬出去，而是每逢需要，就宣神父进宫。后来，不再是必须修钟时才得获准进宫，而是特许神父一年四次定期入宫，而且只要太监宽容，神父们还可以随意把路过北京的神父和寓所里的人带进去。

利玛窦的保护人当中有一位叫冯慕岗的。冯慕岗在湖广任职时就听说过利玛窦，当时利玛窦住在南昌，以后住在南京。冯想改正中国数学中的错误，便派一位弟子刘燕青去南昌或南京拜利玛窦为师，而神父却已前往北京。后来冯因不满宦官专权，上表弹劾，反遭诬陷。万历帝下旨将冯慕岗免职并押来北京。冯把刘燕青也带到了北京，在狱中派他携礼物去拜会刚从四夷馆出来的利玛窦。利玛窦也早知冯慕岗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便赶快在他入狱前探望，两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冯被囚禁的三年期间，两人书信来往不断，互相帮助。冯慕岗悄悄地让人重印了《交友论》这本小册子，他亲自作序言，并将刻板赠送给神父；后来又印行了关于四元及其他数学问题的论文、两小张世界全图以及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传教士的一切，在序言中称利玛窦为“进士”。让神父们最感动的是冯慕岗为《教理问答》写的一篇序言不仅文采华丽，而且对道教、佛教多有微词，对天主教则颇为赞赏。冯慕岗出狱不久后就病死了。

另一位保护传教士的要人是南京工部主事李之藻。他虽在南京任职，却住在北京，在利玛窦寓京之初他也给了很大帮助。李之藻也借此机会继续与利玛窦切磋学问。他首先刊刻了《坤舆万国全图》，并自写序

言，刻成后，印刷多本，遍赠友人，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体数学后，写了一部用天体数学解释周髀、浑天、盖天学说的《浑盖通宪图说》2卷，1607年刊行。在利玛窦的帮助下，他还翻译了《同文算指》并刊行。《同文算指》即利玛窦的老师克拉韦乌斯著的《实用算术纲要》，是利玛窦以前学习的课本。全书10卷，分前编、通编、附别篇。前编2卷，通篇8卷。1608年，李之藻又编著了《乾坤体义》，并于1614年刊印。《乾坤体义》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收有李之藻个人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3卷，上卷《天地浑仪说》附有《四元论》；中卷论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下卷是《圜容较义》，讲述比较图形关系几何学，包括多边形、多边形与圆、锥体与棱柱体、正多面体、深圆与正多面体等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周长相等时，任何多边形的面积都小于圆。同理，表面积相等时，球的体积最大。注意这些结论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数学家发现的，公元3世纪帕波斯进行整理，16世纪初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经过利玛窦、李之藻的翻译传入我国。后来，李之藻还与别的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著作。这就使得李之藻不仅与徐光启、杨廷筠一起被称为明

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而是也作为明末介绍西方科学、开启民智的先行者而名垂青史。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不忽视平民百姓，而且有意识地在百忙之中接见某个平民，并与之长时间交谈，也更有礼貌。利玛窦的原则就是不得罪社会的任何一种势力，以求在中国社会站稳脚跟。不过，在韶州居留地的龙华民神父一直对利玛窦这种虽然缓慢，但更为深入的传道方式不太欣赏。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加强对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指导，担任中国和日本正、副省区长的范礼安神父和巴范济神父一致决定派遣一名临时观察员，以他俩的名义去建立中国境内各居留地之间的联系。利玛窦本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由于在北京不能脱身，于是决定由担任澳门公学神长的李玛诺神父代替利玛窦主持华南三个居留地的工作。

1602年初，大概就是趁广州春季集市之机，李玛诺神父来到了龙华民神父主持的韶州居留地。龙华民神父虽出身于贵族，但他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因此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龙华民只得辍学去干别的营生。直到26岁才开始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此后，他努力学习欠缺的拉丁文知识和神学课程。事实上，由于他年龄已大，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完成他的学业，大部

分必须靠他自学。终于在他40岁的时候被批准来华传教。1596年4月10日，他和另外18名传教士一起离开里斯本，在经受了暴风雨和疾病的考验，7个月之后他抵达葡属印度。在果阿稍事休息和学习之后，他又乘船离开果阿，并于1597年7月20日抵达澳门。由于龙华民来到中国时已有相当丰富的阅历，又是自学成才，所以他很容易把问题简化。不过天生乐观、不可动摇的性格又决定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能取得较大成效。他于1654年以98岁的高龄卒于北京，给见到其晚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白髯飘飘，既是威严可敬的老寿星，又像是道教的神仙。

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新来者龙华民迅即被委以重任，他于1597年12月28日抵达韶州。他先学习口语，然后借助于利玛窦神父编写的词汇和译成中文的《拉丁手册》研习文言读物。随即他投入到了狂热的传教当中，初期的顺利进展使他反对利玛窦通过展示三棱镜、向皇帝进贡和富有人情味等方式来传教，他只要求大量的宗教书籍和圣像。但如果认为他全面敌视利玛窦神父的方式，那也是有失偏颇的。比如他也赞成作儒生打扮和研习中国典籍。

龙华民的努力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利玛窦、郭居静和罗如望三人用六年多的时间才至多吸收了25

名新教徒，而龙华民一人在少三倍的时间内施洗的人数超过了300。龙华民的生活也很清苦，平素只吃米饭，礼拜日才有肉，他还拒绝望教者的馈赠，以免混同为化缘乞食的和尚。

尽管龙华民对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不满，但利玛窦并不嫉妒这位仅比他小4岁的神父所取得的成就。当讨论是否因为韶州不利于健康而撤销该居留地时，利玛窦不仅尊重龙华民神父的意见，而且盛赞他热情充沛，谨慎谦虚，表现了谦谦君子的风范。

李玛诺来到韶州时，正是龙华民神父的传教工作受到了一些士子的抵制之时。由于利玛窦当时已正式成为万历帝的门下客，而且京城最显要人士都前来拜会，这使得韶州士子不敢对韶州居留地有过火的举动。李玛诺也向龙华民指出是利玛窦以其盛誉的威望在中国境内庇护着伙伴们和弟子们的传教活动，他应该感谢这位传教团创始人。不过，龙华民迅即对利玛窦的工作作出了公正评价，因为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自己的成绩有些是瞬息即逝的，甚至会带来严重后果。

当利玛窦在北京继续活动的同时，李玛诺离开韶州，来到了南昌。南昌居留地情况比较糟糕。首先是由于利玛窦匆匆离去，未来得及完成对显贵望教者的教育，其次是因为传教人员调动过于频繁，其中罗如

望神父只是经过了一下。而且在南昌的士人对居留地的存在不满。这些士人包括应试落第者、得中而求官者、闲置官员，尤其还有无所事事、惊扰不已的皇族阶层。在南昌主持传教工作的苏如汉神父健康状况极差而陷于瘫痪，站起来的时间不多，多半是躺在床上，害着晚期的肺病，通常卧床不起。苏如汉神父最大的成就是把一本对望族者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小册子译成了中文。龙华民神父获得苏如汉的手稿之后，立即印出，发给自己的望教者。

虽然南昌的居留地迫切需要帮助，但李玛诺神父却不能在南昌长期停留，他继续前往南京。在南京，利玛窦有过较充裕的时间，传道工作贯彻始终，基础比较好，而且继任的郭居静神父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后来罗如望神父又来充当郭居静的助手。两位神父身体虽都不太好，但当李玛诺到来时，传教事业在利玛窦奠定的基础上已有一定的发展。

李玛诺滞留南京期间，就写信告诉利玛窦他已到达南京。利玛窦立即回信，请他尽快前来北京，以便转告各位传教士的意见，以供讨论并采取一致的做法。李玛诺从澳门出发时还带了一位青年画师，名叫雅各·倪法。倪法1579年出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在神学院受过驻日传教团内当地画派、

欧洲艺术流派创始人乔万尼·尼科劳神父的传授。倪法陪同李玛诺神父北上，由大运河首途京城，一路顺利，于1602年8月10日正当酷暑之时进入北京。李玛诺和利玛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讨论传教组织问题。利玛窦发现李玛诺非常喜爱中国，不胜欣慰。但李玛诺却不能够充分赞赏利玛窦到处博得高度推崇的巧妙做法：“他是那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是在他的故乡常常碰到的那种，他们内心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细腻的克制感，同时坚韧不拔，热情充沛，奋斗不懈，不为狂热所动（例如，他严厉禁止他的教徒砸偶像），他所到之处随时都乐意承认并赞美当地的好的东西。”

1602年10月10日前后，李玛诺神父携塞巴斯蒂安·费南德斯修士返回南方。他首先到达南京，给罗如望神父传达了利玛窦的指示。年底，李玛诺神父从南京启行前往南昌，郭居静神父由于健康原因须往澳门治理，故一同随行。到达南昌以后，李玛诺留在南昌陪同苏如汉神父，郭居静神父则继续前往，经韶州抵达澳门。1603年2月，范礼安神父来到澳门，命利玛窦留任驻华传教团教长，批准李玛诺代管其他三处居留地。

留在北京的利玛窦在1603年却经受了自在北

京获得自由以后的第一轮冲击。事情的起因与宫廷斗争有关。从1586年开始，万历帝就想立宠妃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但遭到朝臣的反对。1601年万历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封郑贵妃之子为福王。但斗争并没有结果，太子和福王各自的党羽依然纷争不已。神父们与宫内的太监关系很好，要不是利玛窦的巧妙克制，实难不卷入这种朋党之争。这些宫廷斗争中还夹杂着宗教论争。京城的一些士大夫早已对利玛窦等人公开攻击佛教忿恨不已。例如，有位翰林院编修四川人黄辉休妻以过独身生活，同许多其他佛教信徒一起敦行佛事，他通过四夷馆馆令，把利玛窦的全部中文著述都搞到手，然后，为了不致降低身份去请求会见，设法佯作在一次宴会上偶遇神父，席间广征博引，同利玛窦辩论不休。随后，他又得到礼部主客司郎中蔡惠泰的支持。这位郎中本来就力主不许传教士居留京城。这位显宦的弟弟在兵部供职，与黄辉合谋批驳——他先朱批，黄辉再墨批——利玛窦的著述。由于黄辉在北京名气很大，利玛窦考虑与他直接交锋可能很危险，便只驳斥蔡惠泰弟弟的观点。虽然如此，黄辉和其他几位要员还是上本皇帝，攻击神父们和基督教。

1603年11月，北京发生密揭事件。此揭指责万历帝、皇后和几位大臣意欲废太子，另立福王，

揭中提名道姓的文武大臣 10 余人，都被指为太子党。此事把京城上下搞得个个惊惶不已。万历帝严命彻查，务擒罪犯。然而，诬陷也好，告密也好，结果只是把监狱塞满了无辜的官员。宰相沈一贯借此机会打击皇太子的老师郭正域以及沈鲤、陈禹谟、毛尚文、王中等人，而这些人又对沈一贯的门下施行报复。四夷馆馆令竭力要把神父们拉入此案，便要求他们同高丽使臣一起重归他的管辖。那两个月中，神父们只好闭门不出，不和京城显宦交往，以免引祸烧身。

密揭风波过后，利玛窦率众人又开始了传教工作。庞迪我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相当熟练地学会了说、读中文，能用中文传教。而倪法修士只敢悄悄地工作，不敢让皇帝和大臣知道他的绘画才能，以免整日陷于俗务。短短的时间内，京城就有 70 人皈依了天主教，而望教者当中竟然有皇后的妹妹。

为了进一步搞好传教，就必须革新传教手段，仅仅依靠神父们的说教是不行的。但如何把基督教概念用汉语词汇准确地表达出来一直是个大难题，且要印行一本中文传教书籍，事先必须得到果阿宗教裁判所的审核，周期很长。利玛窦在其他神父的协助下，用两年多的时间重新编译了《基督教教理》，在经果阿宗教裁判所首肯后，这本书就在北京刊印。刻板保留

在居留地，随时根据需要而增印。其他三个居留地也自己加以翻印。不久，果阿宗教裁判所又批准驻华传教团可根据传教需要自行刊印必要的书籍，不必请示。

与此同时，利玛窦把“四节”、“六经”中有代表性的句子摘录下来，补入他与释三槐1599年在南京的谈话，1601年在北京同李戴、冯琦的谈话，编成一本名为《天主实义》的小册子，此书由冯慕岗润色之后文采更佳，冯又亲作序言，1604年他出资将此书刊印了200册，自留数册之外，其余全都送给了利玛窦。是年，利玛窦的《交友论》再版，他的《二十五箴言》也已由徐光启和冯慕岗作序。徐光启这位明末的大科学家和天主教的保护人与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是紧密相连的，让我们对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交往作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徐光启，1562年出生在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由经营商业转归为经营农业的家庭。他的家庭，从其曾祖父起，在六七十年间，曾有三次较大的起伏。而他正好诞生在家道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活泼矫健。1581年，他考中秀才。中秀才后，因家境关系，徐光启开始在家乡教书。加之连年自然灾害，他参加举人考试又屡试不中，这期间，他备受辛苦。大约在1

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他在韶州见到了郭居静神父。这是徐光启第一次与传教士接触。

1597年，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 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但不久焦 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在回乡途中经过南京时，他去拜会了利玛窦。但与其说是天主教吸引了他，还不如说是利玛窦所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回乡以后，徐光启一边教书，一边涉猎古今，尤其是注意当代问题。

1601年，徐光启再度赴京应试，但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来名列进士榜第七名，但却因为考官糊涂，应取300名，却登录了301名，于是必须抽签以决定取消一名。恰恰是徐光启运走华盖。一气之下，徐光启又去韶州教书。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由罗如望神父施洗，教名保禄。

1604年，徐光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这一年春帙，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在未中进士之前，徐光启曾长期辗转苦读，在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主张禅静

顿悟，反对经世致用，实为误国害民。所以他决意从传教士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1606年，徐光启在北京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次年译完并付印。《几何原本》是公元前4至3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著的几何教本，共13卷，1—6卷为平面几何，7—10卷为数论，11—13卷为立体几何。利玛窦首次将它介绍到中国来，此前瞿太素已译过一部分，但未刊印。欧几里得在书中所表现的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论的纯几何证明以及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的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未曾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6卷的翻译，就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他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明显的书。这次翻译的《几何原本》用的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韦乌斯的注释本，是利玛窦以前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同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测量法义》，全书设15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徐光启考中进士的1604年是大比之年，应试的士子多达5000，加上他们的朋友，人数超过了3万。此外，还来了谋求官职的人，以及受到参劾的官员。利玛窦趁此机会竭力同已设有居留地的那些城市的官吏们联络，故意显示自己和皇上以及京城显贵的密切关系，希望以此遏制没有居留地的其他城市的人们对传教士的不满举动。为了吸引士子们，利玛窦举行了一系列传道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和在韶州等地一样，在天主教堂里陈列西方书籍以及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这年夏天，北京连续两个月大雨滂沱，大水泛滥成灾，官府赈济灾民，神父们也想奋力救济穷人，但苦于经费不足，心有余而力不足。

之所以出现经费短缺，是因为葡萄牙人的海上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是英国人的迅速崛起，海军舰队力量增长很快，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得惨败。之后，英国商船开始在海面上横行。其次，荷兰人也拼命地想插手欧洲与东方的贸易。荷兰人认为要损害他们的死敌西班牙，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在欧洲打击它，而是在远东破坏与西班牙合伙的葡萄牙的贸易。1602年，英荷联合舰队在印度洋科罗曼德尔海岸以外洋面上俘获一艘运送往销日本货物前去马六甲的葡萄牙商船，给予葡萄牙人的贸易以重大打击。1603

年6月和7月，澳门商人又连遭三次灾难。先是运载一年收益的船，被荷兰人在新加坡海峡俘获，几乎与此同时，一般满载供应马六甲货物的商船也被抓去。不久之后又有一次更为惨重的损失。1603年7月30日中午，日本货船“那保丸”号停泊在澳门港内，准备次日起锚。因为要远航，负责押运的官兵都上岸购物、游玩去了。傍晚时分，两艘荷兰武装舰船突然从隐藏的附近小岛出现，兵不血刃就掳走了满载着商品和财宝的货船。荷兰人为卸下船上的货物，整整忙碌了10天。这艘货船是澳门的主要生活资源所系，丢失了它就使得该港濒临毁灭，其损失无法弥补。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年荷兰人不设法拦劫从中国到日本或从日本到中国的货船。

这场灾难几乎决定了驻华传教团的生死存亡。范礼安认为：经费是现代传教团的支柱：没有经费，天主教传教事业，不管多么忘我献身，也不可能取得进展，甚至很难守住在异教地区取得的传道阵地。……宗教信仰的发展像任何人类事业一样，要发展就需要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在传道事业中，一个传教士有了经费，就可以获得有良好训练的助手，就可以开办学校、药房，就可以行种种功德，从而独自一人获致比许多没有财源的传教士多得多的成果。经费的短

缺已使驻日传教团陷于瘫痪。本来范礼安神父计划在中国的每个居留地配备三名神父、一名辅理修士和足够的衣食费用。同样的问题不仅使范礼安的计划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使驻华传教团彻底瓦解。但范礼安又一次给予了利玛窦有力的支持。范礼安在1604年4月7日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根据耶稣会的章程，我向咨议们陈述了我的加强中国居留地人员和经费的计划。他们都提出人力财力不足，表示反对；还要求把四个居留地撤掉两个，只保留北京和南京，增派传教士也暂停。虽然四面八方需要都很急迫，我还是决定这几个居留地一个也不放弃。同时，既然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派三位神父前往，使每个居留地都能有两位神父和一位修士，而北京是三位神父。”这一倡议由于得到了总会会长的首肯而得已实施，驻华传教团又一次由于范礼安而得以保存。利玛窦对范礼安神父的支持更是感激不已。同年8月，李玛诺、费奇观、黎见罗三位神父到达北京。10月，李玛诺去了南昌。

在北京居留地的神父增多了，1604年9月，利玛窦的密友冯慕岗在囚禁三年之后终于出狱。但力量并非只得到了加强。1604年不仅仅是会试之年，也是严格考核在任官员政绩的一年，至少有3000

名官员以不同方式遭到惩办。其中就包括利玛窦的保护人之一李之藻，他被降职使用三年，罪名是反复无常、过分宴乐以及超乎常情溺于棋戏。1604年，反对太监专权的东林书院成立了，利玛窦的不少朋友也参加了，但东林书院中反对和抨击基督教的人也不少。徐光启在帮助利玛窦平息了《教理问答》的刊印所激起的佛教徒的愤慨之后，也于1604年年底回上海去接妻室和老父。不过，1605年初春，骆入禄、林安多、高一志(即王丰肃)三位神父抵达南京，同罗如望神父一起工作。3月份，瞿太素在南京接受洗礼。6月，犹太裔中国人艾田进士拜会利玛窦，从此利玛窦开始探索中国犹太人来源和基督教(及犹太教)更早时代传入中国的情况。

利玛窦领导的驻华传教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在天主教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事实被无限地夸大了。一封来自罗马的信祝贺他给中国皇帝和南京几位要员施了洗，还劝说他们的家人也入了教，总人数超过了100。尽管利玛窦再三否认，种种不合情理的传闻在罗马越传越神，以致于耶稣会总会长开始吩咐讨论派遣40人前往协助这样宏大的传教事业，而其他教派还当真派了数百名教士绕道墨西哥来中国传教。结果发现中国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能轻

易进入和随便传教。

于是，利玛窦写了一系列报告来澄清不实的传闻，并对传教工作作了一些总结。1605年初，利玛窦写道：“在中国，通过我们的科学，就能收获累累硕果。……我建议，所有在这里的神父努力学习中国文化，把这作为一种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教团存亡的事情看待。”他在5月12日的信中要求耶稣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籍来北京。他在7月26日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更加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上帝的意志明显促成了我们进入并居住于京城，我常常默念此一意志，使自己在这么大的困难中鼓起勇气。我父您可以想象，外国人数这么少，还要摧毁生活着数以百万计偶像崇拜者的一个国家里的庙宇和偶像，碰到了多少障碍！按照帝国的法律，我们向皇上朝贡之后，赏给我们银子，然后就得遣返回国，至多赐给我们京城一官半职，得受某一衙门的约束，我们的传教事业就会受到严重障碍。官员们就是按照这个意思上奏皇帝，请求至少把我们赶出京城，只是皇上不肯。另一方面，皇帝想要我们做官，我们表章上去力辞，不仅不要当官，也拒绝官员待遇，……不过，我们还是保留了待遇，并无官职，这就避免了任何官儿的干扰！所以，中国人人都知道我们在征集教徒，

还招别的人，但谁也不敢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皇上的意思是要我们留在京城，我们只要扬言要离开北京回国就够了。例如，最近有这么一件事：有位大官说要取消皇上给我们的恩俸，因为他说享受俸禄而不任职是违反中国律法的；我就传话给他说，请他明示其意图，如果确定，我要去觐见皇上辞别，明言我远离故土已经三载。这个威胁果然奏效，他转告我说月俸将继续给我，阴历年底他将与同僚商议。从此，再也没有人谈及此事。”

关于利玛窦在华传教成果的传闻与澄清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传教士们编撰的东方传教史中就有相当篇幅是记述和介绍中国的。

这一年年初还发生了一件让利玛窦担惊受怕的事情。由于欧洲人不断入侵东南亚国家和在中国沿海骚扰，所以在中国人看来，不仅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和新来的荷兰人，都是嫌疑分子。而恰恰在1603年10月，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屠杀了将近2万中国侨民。传教士们很担心这一事件引起中国人对所有欧洲人的愤恨。1605年初，利玛窦在写给罗马某人的信中说：“2万中国商人被屠杀的消息，不知是否已传到你们那里；在中国京城人们在

广泛议论，我们担心会有碍于我们，尽管在这一事件之前我们就避免显得好像是西班牙人的朋友。但是，凑巧在屠杀事件之前，中国皇帝派了一位官员前往菲律宾，调查关于某个中国人散布的谎言的事情，西班牙人给予盛情款待，还送礼给他，写了一封信给沿海省份福建的总督。这封信的汉译文带至北京，据说其日期写作‘天主纪元’1603年，而‘天主’正好是我在《教理问答》里使用的词。上帝保佑，谁也未加注意，除了徐光启之外，不过我请他慎勿言及。”

多年的来回奔波、巨大的压力和过分操劳使利玛窦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离开家乡快20年了，他也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和故乡的一切。1605年的5月，他写信给家里人说：“老实说，我再也不能指望有好多年可活，我现在已经须发尽白；中国人见我岁数不算大，就已经这样苍老，很是惊讶。”

不过，利玛窦从来都是勇往直前的，但他又从不蛮干。在北京居留地尚未巩固建立的时候，利玛窦对吸收新的教徒一直持慎重态度，但一俟处境有了较大保证，他就精神抖擞地全力从事他来华主要要干的工作了。不过，利玛窦打算稳扎稳打，宁愿教徒不多，但个个热诚。

所以1605年5月，他就写道：北京的教徒比

别处人数少，但质量极佳。最令他束手无策的是在北京没有一座公开的教堂。因为神父们在北京的4年多时间里，虽然搬了四五次家，但居留地所处位置总不太好，房租又贵。想买房，在澳门的范礼安神父却无力为他们筹集到这笔钱。但利玛窦下决心结束这种流浪生活，因为3个神父，2名备修者和一两个其他申请者，再加上9名仆人，实在无法同时住在狭窄的居留地里。不久，利玛窦就获悉宣武门前有一栋房子出售。居屋非常宽敞，大小房间大约有40间。因为房屋不太新，而且又说闹鬼，所以售价不太贵。利玛窦实地察看了房屋之后，又征求了徐光启的意见，终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买下这栋房子。于是东挪西借凑够了钱，3天之内就成交了。1605年8月27日，利玛窦和众人迁入了新居，不久就整修出一间美观而宽敞的小堂，张挂起救世主像。报告给范礼安神父之后，他派人送来了所需款项。这次乔迁标志着北京居留地历史上的新阶段，此处寓所以“南堂”著称。

在韶州居留地的龙华民神父由于有了泰德希神父和骆入禄神父的加入而力量大增。虽然佛教僧侣想方设法禁止神父们传播天主教，但神父们在官府的暗中支持下，击退了和尚们的进攻。在南昌居留地，由于李玛诺神父和苏如汉神父的努力，到1605年12

月，天主教徒人数翻了一番，将近200人。由于教堂太小，以致只能分成三拨做弥撒。在南京居留地，虽然只有罗如望神父一人从事传道工作，黎见罗、高一志、林安多三位神父只努力学习中文准备将来更好地传教，但罗如望神父不仅通过南京户部尚书张孟男的关系新买下了一栋房子作居留地，而且教徒也逐渐增多，1602年年底只有50人，1603年、1604年两年就增加了96人，而1605年又增加了将近100人。

范礼安神父看见驻华传教团在困难的条件下意想不到的壮大起来，就坚持要求耶稣总会送神坛饰品、书籍、图画等来；他还准备在日本筹集一笔巨款，分配给在中国境内的4个居留地。利玛窦便邀请范礼安神父来视察4个居留地的情况，并且利用他的关系为范礼安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在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写信要他的同窗好友予以关照。南京户部尚书张孟男发给了官照，命令沿途护郭居静神父及其同行者并代付其旅费。因此，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从日本筹集的款项一到，范礼安神父就可成行。但就在这时，1606年1月20日范礼安神父因肠梗阻突发而死亡。噩耗传来，利玛窦老泪纵横，悲痛不已，他不仅失去了一位领导者，而且失去了他的事业的最

大支持者和战友，也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

范礼安死后，又发生了一件危及整个驻华传教、澳门本城以及葡萄牙人同中国人的贸易的可怕事件。前面我们已经说及荷兰人抢掠葡萄牙船只，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抵御荷兰人的进攻修筑了不少工事，这就引起了澳门所依赖的香山知县和广州官府的怀疑。在传教士们建造澳门大教堂过程中，直至完工以前，教堂周围都用席子挡着；大部分工人是日本人，一般都是基督教徒。不少中国人怀疑他们建的是炮台，只是因为耶稣会士送礼送到了点子上，广东官府才允许他们建造。大教堂落成以后，耶稣会士在澳门附近的青洲小岛上建造一栋房屋和一所礼拜堂。一些中国官员焚毁了房屋，并与葡萄牙人发生了冲突。冲突在香山知县和澳门殖民当局的调解下虽告平息，但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不满情绪并未消除。就在此时，澳门的传教士又内部发生分裂，有些反对耶稣会的传教士到处宣传，说是耶稣会神父们在密谋策划串通某些葡萄牙人、荷兰舰队以及随时抵达的倭寇，进攻中国，而有些中国人正由内地的传教士纠集在一起，准备里应外合；又说是要从本城的居民杀起，就像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侨那样，将以澳门圣保罗公学为堡垒，由信教的日本人发信号，洗劫广州城，然后攻占全中国。

远征军的首领已为人们所知，经常往返于中国内地与澳门之间，他就是会说中国话、打扮成中国人模样，熟悉去南京、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郭居静神父。

这些谣言很快在澳门和广州传播开来。一时间，澳门所有的中国人惊恐万状，仓皇弃城他往。驻节韶州的总督便下令广州加强防务以防万一。这时已是1606年2月，广州官员紧急举行了特别作战会议。有一官员认识郭居静神父，并且主动提出由他亲往澳门，就地调查事情真相，但在广州还是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下令逮捕任何洋人，尤其是受剃度、宣扬独一无二上帝的教士；将广州城分区分片日夜守备，关闭几座城门，给民众散发武器，拆除城墙外800多民房……与此同时，总督上本北京，弹劾让葡萄牙人在澳门设防的官员们渎职。

恰好在这时(1606年2月20日前后)，发着高烧的方济各·马蒂内修士带着南京颁发的、允许范礼安神父免费旅行的官照从韶州来到了广州。有人告诉马蒂内修士范礼安神父已经去世，而且目前广州局势混乱，要他马上离开广州。但马蒂内修士想与澳门神长商量之后通知在韶州的神父们。从澳门到广州散布谣言的人知道马蒂内来了，就向官府告发修士是澳门密探，被洋神父派来，与其他同伙藏匿在此，策划

阴谋。于是刑名推官派人将马蒂内和他的仆人抓获。由于在马蒂内的行李中发现欧文信函、欧洲出版的书籍、葡萄牙式样的衬衫、长裤和其他衣服，于是马蒂内被认定是从澳门来的，而不是来自内地，他的官照是伪造的。告密者还设法使刑名推官相信马蒂内是个大魔术师，有隐身邪术并能水遁，只要面前有一点点水，就能由甲地遁至乙地。所以，马蒂内由于原已发烧，在狱中又得不到医治，没有水喝，不久就死于狱中。

虽然广州兵备道在率部加紧戒备以防澳门进攻之后，还派人到澳门调查，发现葡萄牙人正一心一意自相争斗，根本不想进攻广州。但广东民众对传教士们的不满仍有增无减。最后广州官府公布了天主教传教士的 11 条罪状：一、他们越出了皇上管辖；二、在澳门建造了一座堡垒；三、纠集倭寇，意欲侵犯中国；四、进行间谍活动；五、本身是魔法师、行妖作祟；六、在日本有兄弟并与之书信往来；七、又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魁首；八、会制造白银；九、进中国来宣传新宗教并煽动革命；十、毁坏偶像，不经圣上准许，擅自讲授其学说；十一、曾被官员驱逐。

这些罪状有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点荒诞，但在当时出现这样的控告本身就说明利玛窦对中国社会状况

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用缓慢而温和的方式逐渐进入中国社会，龙华民神父所在的韶州居留地的情况日益恶化就从反面证明了利玛窦的方式更有效。

在追查葡萄牙人内犯案件的同时，有韶州居民在有一天的黎明时分想纵火烧毁居留地，幸好火势初起就被发现了，继而扑灭了大火。不久，又有人向韶州控告龙华民与人通奸，虽查无实证，但神父的威信大减。

这时，原任韶州分巡道的夏明德从北京返回，来广州继任海道。他在北京时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利玛窦送给他一具日時計。夏明德国一上任就着手调查葡萄牙人是否真的在策划进攻广州。发现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之后，相关的官员都受到了惩处，广州也逐渐恢复了平静。在北京的利玛窦等人也四出活动，平息京官对葡萄牙人入侵事件的恐慌和不满。

这时已是1607年了，但事情的影响未完全消除。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郭居静不适宜再来中国内地。利玛窦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就希望总会能批准郭居静留在澳门。但郭居静本人以为他是冤枉的，仍想去内地传教。于是他改了名字，和熊三拨神父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从澳门出发想去北京。走到南雄以前，一切顺利，可一到南雄，他就被认出来了，只好折回韶

州。非常幸运的是夏明德正好到了韶州，龙华民又给夏明德送了一具三棱镜。于是夏明德为郭居静疏通了关系，郭居静得以重新启程，直抵南昌。但利玛窦不敢让他来北京，就命令他去南京居留地，让熊三拨径往北京。

耶稣会在中国南方的三个居留地日益受到怀疑，利玛窦竭尽全力想予以缓和，但他在北京也不敢轻举妄动。过度的操劳使他更显苍老。1607年8月，在南昌居留地的苏如汉神父久病之后送到澳门就病故了。与此同时，神父们为了在南昌筹办一所小规模公学供教徒的孩子们念书，花了1200杜卡托(货币单位)，买下一幢房子。这笔钱本身数额不很大，但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很了不起。10月11日，8名秀才控告神父鼓动叛乱，又递上状纸给兵备道和按察司，被驳回以后，发誓要告到刑部去。随后他们又聚集了300人在文庙开会，写稟帖给卢姓知府。卢知府也受到过利玛窦的好处，暗中偏袒神父但竭力不表露于外，只是把稟帖压下不理。秀才们越来越激烈，趁10月21日祭孔之际，向布政司告状，布政司批转专管读书人的提学办理。同一日，27名秀才向二位大人递上状纸。于是李玛诺和孟戴斯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卢知府到处宣扬李玛诺的伙伴利玛窦在北京很有

势力，加之鼓动叛乱证据不足，最后，由布政司和提学共署、知府副署颁布公告，命令神父将新房子归还原房主，停止宣传，不得再公开展示救世主像；至于教徒，也被要求不得为信奉洋教而背弃中国学理。

然后很多南昌人对此判决不满，有人在知府衙门口埋伏，想等李玛诺被释放出来时揍他。幸好被人制止。秀才们又写了一本书，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皇明名称为‘大中华’，彼竟称其国为‘大西’！吾皇为‘天子’，彼上帝竟称‘天主’！其历法异乎我皇历！彼耶稣、玛利亚名字饰以弓箭弋矛之类，阴谋祸害莫此为显。”秀才们还径直称李玛诺神父“犬身狼面，一肚子妖术邪法”。为了避免矛盾更加尖锐化，李玛诺未敢书面或口头反驳，反而劝告教徒们要收敛，劝他们不必大肆张扬地在大门口悬挂救世主像，可以仅仅佩戴念珠表明宗教信仰。

北京居留地的处境比南京、南昌、韶州要好，利玛窦十分清楚北京居留地对其他三个居留地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内地的神父可以利用利玛窦在北京根据皇帝的旨意，依靠皇家经费，传授同一个宗教的经验，而且因为利玛窦结识了许多官员，他可以利用与这些官员的交情托他们照顾在他们管辖下的省份内的传教士。在北京的其他神父对他的帮助不大，他最老

的伙伴庞迪我虽然承担起一部分会客任务，也只能稍稍起点作用；堪称表率的费奇观神父1607年离开了他，前往南昌创立备修院；熊三拔大约在此前后来到北京，但只是逐渐熟悉业务。事实上，北京居留地重担几乎全部由他一个人承当，他经常在给别人的信中说简直累垮了。

在一切事务中，最费时间的是接待和拜会，以及同散居中国各地的显贵人物通信。来北京的人川流不息。按照年份的不同，晋京或为朝见皇上，或为应文科或武科考试，或为诠选某些官职。而每年都有一个月，规定外地官员来京祝贺万寿节，另一个月用于授官职。从各省涌来的成千上万的人士中间总是有许多人是同在京的或内地的神父早有交往，或者听人说起过，或者读过他们的著作，也有朋友介绍来的。所以神父们得成天待在接待厅里，随时候驾，这是很累人的，但神父们还是竭力好好接待一切人，争取他们的好感并向他们宣扬天主教。利玛窦以他娴熟的交谈技巧、温和的性格和博见多闻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仰。他还收留了几个被抛弃的儿童，由居留地出钱抚养，这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

无论在什么时候，利玛窦都没有忘记用种种奇巧之物，继续同达官贵人朋友保持融洽关系。如有手画

的扇子、仿欧雕刻装饰的中国砚台、日時計和其他洋玩艺，这些促使人们不时怀念他，甚至给利玛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耀。如《坤輿万国全图》竟然得到了万历帝的喜爱。1608年8月22日，万历突然下旨宣神父进宫。利玛窦和庞迪我迅即前往数学院太监们的住处，见着他们的院长和其他若干人都在异常忙碌，因为皇上从宫内传旨，命献6轴12幅绸印《全图》。原来有神父馈赠太监若干李之藻复制的《全图》，不知其中的哪一位将其中的一幅加上各种绘画装饰之后献给万历帝。利玛窦此前并不想把这类地图进贡，因为担心万历帝看到中国这么小，会大发雷霆，责怪神父们蓄意在图上缩小中国，藐视中国人。事实上，这正是许多士大夫的看法，他们很不满意，说神父把外国夸大而把中国缩小了。但万历帝看到这这么多国家，习俗不一，地图又绘制得如此精美，非常高兴，就想搞到若干份，赏赐太子和其他几位皇亲，让他们装饰住宅。皇帝和内侍看到地图上有利玛窦的名字，便传旨让他复制。但李之藻使用的雕板已被他带往故乡，而入轴版的雕板，又与万历帝看到的大不一样，宦官们不愿意用。最后利玛窦提出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由他另制一个比旧版好得多的新版。但万历不同意，只吩咐在宫内依据李之藻原版刻制，于是宫里到处都

挂上了地图。

利玛窦也继续和宫内的太监们保持融洽的关系，经常往来，互有馈赠。

利玛窦强调科学知识对传教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中国士大夫都能懂得或对他传播的数学知识感兴趣，因此他也重视在伦理哲学方面的宣传，他写的《交友论》和《二十五箴言》，由他自己和李之藻等人一版再版。1606年他又写了一本名为《似是而非》或《通常见解以外的真理》的小册子。此书1607年奉省区副教长巴范济神父之命出版时定名为《畸人十篇》。这是一部例证、比喻、格言、箴言的搜集，选自欧洲哲学家和经学博士以及圣书的引述。到1608年8月，这本书已有两三次重印，其中一次在南京，一次在江西；在北京虽已散发数百册，但索取者还不断涌来。

利玛窦想写更多的东西，但他太忙，尤其缺乏书籍。他写作《畸人十篇》时就凭记忆和少量的几本书作为参考。为此利玛窦经常抱怨。1608年，当利玛窦听说，南昌来了一批新书，其中包括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和奥尔特琉斯的《世界全图》时，他就吩咐把它们运往南京，同时要求把奥尔特琉斯的那部著作送至北京。此外，他还力促在外国与他通信的人写信来

北京向他描述古罗马并附以照片。

1607年和1604年一样是会试之年，李之藻被授予新职。1608年5月前后，李之藻重返北京城等待正式批文，趁在北京的三四个月时间，李之藻又到利玛窦那里学习欧洲科学，学习制作日時計和几具非常准确的测量仪。他还自己译出了克拉韦乌斯有关求平方根、立方根乃至无穷根的实用算术。这时的利玛窦虽然仍是驻华传教团教长，但北京以外的3个居留地由李玛诺神父代管。利玛窦和李玛诺合作很和谐，不料，耶稣会总会长却把李玛诺调到澳门，让他专向他的众多商人朋友开辟财源。利玛窦对此颇有微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希望继任的龙华民神父能到达北京，以便商议和协同一致，但龙华民神父又由于事件缠身，不能离开韶州。由于李玛诺神父走了，罗如望神父把南京居留地领导责任移交给高一志神父，自己去南昌。韶州居留地由于泰德希神父的过世，力量也削弱了。

就在这时广东省又出现了一件对传教士不利的情况。一个仆役携带传教士的信件从澳门入境，因为对看守城门的兵卒没给小费，被扣了起来，然后移往广州知府衙门。虽然信件内容没什么了不起，但中国内外之间的这种联络始终是背嫌疑的。据此，知府认为

有权把龙华民从韶州驱逐出去。好在这一判决未能立即执行，恰在这时知府的父亲又去世了，知府回家守孝去了。就在这种紧张情况下，李玛诺神父和骆入禄神父试图把泰德希神父灵柩运往澳门。1609年8月，两位神父和一名修士从韶州出发，但到广州郊区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在一个船上躲了40天，期间由一名船夫把棺材送往澳门求救。但澳门从7月25日起就处在荷兰人的包围和威胁之中，直到9月13日局面才重新稳定下来。澳门处于这种防御状态的时候，两位神父还是设法由一个渔夫带领，从运河网曲曲折折进去，并于10月21日抵达澳门。

外来的种种复杂形势并不能使利玛窦灰心丧气，相反他坚定地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最佳途径。这从他1609年2月15日给直接上级副省区长巴范济神父的一个长篇报告中可以充分显示出来。他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传教充满希望的原因。

“一、本传教团的创建虽然也有过许多困难，但现在基督教徒以千计了，在北京和南京都有，且他们都享有道德高尚而又饱学的盛誉。二、在这个国家学问极受敬重，因此很容易讲道理来证明我们信仰的真理，只要我们紧紧吸引住最有声望的人士，使其他人皈依就很容易了。三、有刊印的书宣传就很容易。四、

中国人天生极为聪明，为我教给他们的那么一点点数学和宇宙学非常感谢我们；假若我们传授更为深奥的科学、物理、形而上学、神学和超自然各科，那岂不更妙吗？五、虽然好些人否认，其实中国人天然倾向于虔诚。六、这个国家一向太平安宁，我们竭力让他们明白基督教是多么与叛乱精神格格不入。七、我们的人用心研究他们的典籍，博得了学者、圣人的美名。我对这一点更为重视，比多吸收 1 万人入教还要重视，因为这是为使这个国家普遍入教作准备。八、如果说儒教并不关心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却几乎完全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教人伦理；因此，我利用伦理观念驳斥其他教派，解释那些似乎有违我们神圣学说的章节。通过这种办法，儒士远非我们的敌人，反而成了我们的朋友。”

虽然韶州、南昌、南京 3 个居留地都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北京的教徒到 1609 年 12 月已达 400 多。由于徐光启回上海老家为父亲守孝，他协助郭居静神父在上海又开辟了一个传教基地。

李之藻在外放任职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北京，不仅继续跟利玛窦学数学，而且热心帮助利玛窦。让利玛窦倍感欣慰的是，他终于实现了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1609 年 9 月 8 日，他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圣母

会，由教徒们自己制定规章，利玛窦略加修改，增加了若干关于忏悔、祈祷以及关于经老会员同意后吸收新会员的规定。

利玛窦在北京获得成功之后，自认为他最忠实的知己和直接下属会稍稍信任他一些。但他很快失望了，他的上级要求他尽快取得正式的居留权，他的下属对他的传教方式仍颇有微词。这使利玛窦感慨万千。大约在1608年底，他突然想到，最早进入中国的神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开始的情况再也没有别人知道，而且他也自感时日不多，就想把驻华传教团在中国的一切都按事件的先后顺序写下来。事实上，到1609年，利玛窦还是事务繁忙，他抽不出时间来汇编各居留地送来的汇报和他自己生活于中国期间写下的笔记。只是到了这年年底和1610年的头4个月，他才有了必需的空闲来写作。这部利玛窦在临逝世前才完成的手稿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虽然上级和下属对利玛窦的不理解使他很痛苦，但他依然很热爱他的事业，1610年的头几个月他以难以置信的热情来巩固他创下的基业。1601年又是举行会试的年份，来京的举子达5000余人，同时来京面圣的官员也不低于此数。利玛窦趁此机会与广州布政司和按察司长久交谈，这就使他们得以消

除对澳门葡萄牙人的不良印象。有四五位官员请利玛窦教数学，其中有即将去南京任新职的李之藻。居留地有许多客人投宿。利玛窦不得不向每个人回拜送礼，疲于奔命。封斋节开始，他往往甚至在入夜以后，还得从饭桌上起身，去迎接客人。

但日复繁重的工作终于耗尽了利玛窦的精力。5月3日，他拜会归来就感到头痛得很厉害，他以为只是常见的身体不适，休息几小时，至多一整天，也就行了。然而，一直不舒服，他只好派人通知熊三拔神父说他感到很虚弱。正在病中的李之藻派来了自己的医生——京城首屈一指的名医。医生认为是当时北京城流行的轻微时疫所致，但他开的处方一点用也没有。数日后，神父们请来6位名医会诊，但他们意见不一致，留下三张处方就走了。选用其中的一张，仍然丝毫不见起色。利玛窦虽然感觉到他很快就要到他的主那儿去了，但他以很乐观的态度与来探视他的人交谈。

5月8日，利玛窦向熊三拔神父行忏悔。5月9日是星期日，他用尽全身力气自己从床上挣扎起来吃了圣餐，念了临终忏悔，他泪如雨下，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下午三四点钟，利玛窦出现了谵妄，并且持续了24小时。星期一晚上10时，他清醒过来，他向他的同伴和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留下了他最后的祝

福。随后他以微弱的声音同身边人交谈。就这样一直挨到5月11日。傍晚6时，他吻过耶稣死难十字架和幸福的依纳爵神父肖像之后，侧过身子就不再动了，好像一个合上眼睛睡定或沉思的人。7时，这位老人终于魂归创造主。享年57岁7个月又5天。

利玛窦神父的葬礼举行了4天。他的朋友们想让万历帝颁旨为利玛窦建立牌坊。经过上表启奏，万历帝终于恩准赐予北京城门外一块坟茔地。他的朋友几经寻觅，最后选定在一个太监的地产上。1611年11月1日，利玛窦的灵柩下葬，把他的一切都留在了中国。在王应麟撰写的碑铭上题名的有好些当时著名的士大夫和显宦，他们都哀悼已被全中国社会完全容纳的一个人——泰西进士利玛窦。

第六章 利玛窦的历史性意义

历史上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间，也许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名字了。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利玛窦作为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对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先介绍一下利玛窦晚年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利玛窦用他的母语意大利语写成的。封面上除了有“耶稣”、“玛利亚”几个字外，没有作其他说明，看来他并不一定要想把它公开刊行。1614年，金尼阁神父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附有利玛窦死后荣哀的记述。这个拉丁文本第一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并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拉丁文本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刊行后，在欧洲不胫而走。

根据原本所翻译的各种文字译本不断出现；计有拉丁文本 4 种、法文本 3 种、德文本、西班牙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 1 种。不过我们中国人仍习惯把它叫做《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

《札记》对于研究明代中西交通史、耶稣会入华传教史、乃至研究明史，都是颇有史料价值的。它的记述的真实性在于，撰写者本人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而且熟悉中国生活的同时代的欧洲人。利玛窦在他的札记第一卷开宗明义便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第二手材料。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中世纪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认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13 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使欧洲人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的鞑靼君王，统治着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隔绝，中国在欧洲人笔下又渐渐成为了传奇。15 世纪末欧洲通往远东的海上航线的开通，欧洲人对中国又产生了兴趣，

相继出现了一些专述中国的书，但作者仅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又不谙汉语，有的甚至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只是将道听途说的记录下来。因此这些著述都不能和利玛窦记的第一手材料相提并论。

《札记》的第一卷用将近 8 万字的篇幅概述当时的中国。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在这一卷中都有具体而细致的描写。第二卷到第五卷记述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不同的阶层。他们不但在一些城市居住和生活过多年，而且旅行过许多地方。利玛窦以他灵敏的感受和一个外国人的局外旁观的态度，把他的见闻详尽地记录下来。他的这部叙述就是一部很好的明代中国游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和地位可以说颇类似于亚瑟·扬的《法兰西游记》之记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情况对于后人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史料价值和地位。

利玛窦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被称为丝绸之国的，正是他所到达的这个中国。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叙及东方大国 Cathay(震旦或契丹)，但欧洲人始终就不知道这是中国北部的别名。直到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北京的四夷馆里曾和一些穆斯林相

处，从后者的口里，他得知中国又叫契丹，才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中国就是 Cathay，或 Khitai 或 Xathai。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契丹名字后来被西方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乃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

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繁荣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有许多描绘，但在利玛窦笔下却更给人以一种真实感。他写道：“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部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种的动植物。”并说：“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马可·波罗完全没有提到并为当时欧洲人所不知道的茶，利玛窦作了简要的介绍：“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饮料。”“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

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另一种使欧洲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漆，利玛窦说它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并且描写道：“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上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悦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凡此都属于中西交通史和物质文化史上的可贵材料。

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述，书中还有很多。例如书中谈到明末上海的情况说，上海县地方不大，户4万，人口30万，但其中从事纺织业者达20万这个数字未必可靠，但类似的记载均多为中国史籍所不具载，因此可以弥补中文史料方面的不足。

利玛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直接的知识，是第一个直接掌握汉语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曾把孔夫子和四书五经介绍给欧洲人。在他的札记中，他对孔子评介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公元前551年，享年70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表示称赞说：“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对中医

也很感兴趣，说：“他们的按脉方法和我们的一样，治病也相当成功。”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并且结交了许多知名的士大夫朋友。他是这样评价中国人的：“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快的人民。”又说：“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他描写中国人的礼貌时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中国人的孝敬长辈和尊敬师友，利玛窦在介绍时，认为这些优点超过了欧洲人及其他民族。

利玛窦根据他和中国人的接触以及他在中国多年的体验，驳斥了有些作者认为中国会侵略别国的说法。他说：“我仔细研究了中国人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过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这个结论出自当时一个来自西方国度的人士之口，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上中西双方民族性格和精神面貌的不同。

同时，利玛窦对当时他所接触的中国社会的弊端，

也用一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指责，并且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帝王为拥有绝对权威而妄自尊大，以一种愚昧的优越感把自己认为是天朝上邦，把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概贬为蛮夷。中国人民在思想上长期受到这种狂妄和愚昧的毒害，也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心和重心。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已经担心，如果中国不是作为中心而出现在地图上，并仅仅占有一块不算大的地方，那么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甚至于攻击。他评论这一点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很骄傲，但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这一评论对于中国式的封建意识，可谓入木三分。也正因为如此，利玛窦所携来的小小三棱镜、时钟和地图竟成为藉以敲破中国森严的思想堡垒的法宝。

在整个札记里，利玛窦屡次描写了当时中国对外那种愚昧可笑的猜疑和隔阂的心理状态。

他写道：“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

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这种情况因为倭寇的骚扰和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而变得更加严重。利玛窦和他的伙伴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也曾备受敌视，并多次遭到暴力的攻击，这在札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述。

利玛窦对明末官僚体制的臃肿无能和吏治败坏，也有详细的描写。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达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得活命。”这几句话几乎是在用素描的手法勾画出一幅明末腐朽的封建政权在权和利的争夺上，其本性是怎样的贪婪、凶残而又无耻。而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正是通过向皇帝、宦官和大吏们赠送礼品才逐渐取得立足之地的。利玛窦对明末中国封建官吏的描述，也颇有其客观性的一面。

上面介绍了利玛窦的札记，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利玛窦生平活动的成就及其历史意义：(一)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尤其是他在多大程度上——像是为某些研究者所艳称的那样——引进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二)他的传教事业(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像是某些教会史家所

赞美的那样——获得了成功。

对于第一个问题，利玛窦作为中西思想文化方面接触的第一个媒介者，他在多方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历史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一直影响到近代。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于19世纪60年代由李善兰补译完成，就可以说是直接上承徐光启、利玛窦的未竟事业的；利玛窦之所以被赐予葬地就是大臣叶向高上表说利氏翻译了《几何原本》，可见人们对此书的重视。他传来的西方科技确实是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水利和火器等几个重要方面涌现出一批专门著作，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境界，格里高里历法的传入，即所谓西法新历或崇祯历法，是从清初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天算知识是当时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贡献；他带来的世界地图第一次使中国开辟了视野，获得了世界眼光，看到了整个地球。水利方面，著名的《泰西水法》虽成于熊三拨和徐光启之手，但也可以说是完成了利玛窦未竟之志。火炮的使用则不仅当时有专书介绍，而且还在明末的战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望远镜的传入并使用于天文观测在中国科学认识史上

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尤其是明人为学素以空疏著称，但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思想与学风却经历了一场大转变，由明心见性的空谈变为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下开清代的朴学，形成了对明学的一种反动；其间西方科技的知识不可谓不是重要的契机之一。清代的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以至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深受西法天算的影响的。利玛窦同时又是开始正面地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自他以后，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逐渐在欧洲流传，开阔了西方学者的眼界。所以，虽然利玛窦的主观意图在传播宗教，但客观上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知识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然而又正是由于其主观意图在于传播宗教，所以利玛窦世界观的落后性就显得惊人的突出。从他的世界图像直到他的思想方法论，仍然紧紧局促在中世纪传统的神学框架之内。他的一系列有关科学的著作还在宣扬九重天或十重天的地球中心的世界图像，还在宣扬中世纪继承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特别是在思想上还在教导着神学目的论的思维方式，这简直是和近代思潮相对抗。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可以说就呈现两种文化的对抗和斗争：一方面是以培根、笛卡儿、哥白尼、伽里略为代表的科学与民主的近代文化，

一方面则是以经院神学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利玛窦虽然也带来了一些近代的新器物，但其整个的思想理论体系却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思想和科学格格不入的。利玛窦的世界观，比起同时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儿之强调上帝也要服从自然的铁的规律或徐光启之力图追求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来，其间的距离简直是不以里计。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论证过利玛窦的世界观要远逊于当时中国学者的水平。所以，在利玛窦那里，科学是手段，传教是目的，以及他的思想违反当时先进科学思潮之主流，这一点更多的要归咎于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不以利玛窦个人的才能和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利玛窦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思想随后弄到几乎是光沉响绝的地步，直到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才重新拾起300年前耶稣会传教士的余绪，而又重新开始。从根本上说，其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佛教和天主教二者所传来的时代不

同；17世纪不仅西方的科学和思想已正式步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也同样在于完成这一由中世纪向着近代的转化，而耶稣会传教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从根本上不可能有助于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利玛窦到中国不久，就采用儒冠儒服，一面介绍西学，一面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典籍，研究中国的宗教和习俗，极力揉合(或者说附会)中国的儒家学说，进行他的“合儒”、“补儒”，最后是“超儒”的工作。这是他获得成功的秘诀所在。他尽量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帝的名称他煞费苦心选用了中国古代的“天”的概念，使“事天”“奉天”的“天学”看来好像并不是一种外国人所强加于中国的外来宗教，而是某种中国原来就有的东西。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像西方神学那种创造和被创造的逻辑的；但利玛窦却以移花接木的办法，利用中国的敬天观念，把天的主宰说成就是“天主”，自称是在宣扬“天教”或“天学”，这一论证手法可谓相当巧妙。他又把儒家区别为先儒和后儒，标榜要把人们从误入歧途的后儒引回正确的先儒那里去。在策略上，他联合儒家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偶像崇拜，但对孔子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拜却并不视为偶像崇拜。这种与中国传统实行妥协和利用的策略使他成功地进入了北京宫廷，然而中国朝

廷却始终把他作为客卿来看待，严格限于只使用他的技术；而中国士大夫所真正感兴趣的，主要地也仅限于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始终发展不大，最后几近于全盘失败。但利玛窦那种百折不挠、坚定顽强的开拓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仰的。在天主教社会，利玛窦也作为远东传教的开拓者之一而受到永久的尊重。

总之，利玛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仍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影响不可否认。